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6月30日第7期 总第18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5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九)

目 录

【专稿】

- 胡拾音 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 2

【怀人】

- 丁向阳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15
- 张若京 王建鑫温州遇难的前前后后 22

【述往】

- 吴 琼 难忘的燕园·1969(四)——未婚妻之死 27
-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六)——回家的路 36
-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抓“五一六” 46

【资料】

- 《新人大》第六期(1967年3月30日) 64

【文摘】

- 侯成亚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 65
- 胡 平 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节选) 67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谈萧宏《广西文革解码》一文在史料证据方面的不足 80
2. 赵昊明谈萧宏的文风 3. 王德生、朱力谈郑仲兵的《文革答问》 81
5. 王复光更正 82

【本刊声明】

【专稿】

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

胡拾音

摘要：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向江青、陈伯达提出了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问题，随后又对吴传启等人进行了公开揭发。这遭到中央文革的打压，聂元梓拒不妥协，于是遭到陈伯达6.5讲话的严厉批评。在陈伯达6.5讲话及随后若干讲话的煽动和挑拨下，引起北大大乱。王、关、戚一伙在让吴传启等人到外地躲避的同时，利用其团伙前台骨干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通过北大某些群众组织及后来的井冈山兵团的某些领导人，力图将北大搞乱。这些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和王、关、戚的骨干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是有来往的。本文引用大量材料指出，洪涛、刘郢、王恩宇同王、关、戚、吴传启团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个团伙前台的重要人物，同他们的来往不是一般的关系，其目的就是搞乱北大，保护王、关、戚、吴传启团伙。井冈山兵团及其前身的某些领导人，同王、关、戚团伙有过割不断的关系，并不是“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记忆》第172期刊载了陈子明、林爻的文章《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相背》，文中斩钉截铁地说：“王、关、戚”和“团零飘井红”没有交集，没有打过交道。“王关戚”和“北大井冈山”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请问，你们是井冈山兵团及其前身“团零飘井红”的领导人吗？如果不是，你们怎么能断言“没有打过交道”？你们知道自己领导人的行踪吗？

笔者偶然获得当年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份传单（定价2分），传单的通栏大标题是：“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图一）。传单为铅印，4开纸，作者是“红代会新

北大井冈山兵团飘红旗战斗队”，原件无出版日期，根据内容推断，应该是1967年12月中旬出版的。该传单上共有5篇文章，标题分别是“评聂元梓的谣言攻势”、“评聂元梓谣言攻势的政治背景”、“聂元梓纵容狗姐潜逃，该当何罪？”、“聂元梓恶毒攻击毛主席，罪该万死！”和“聂氏反革命家族简介”。可见，这是一份全面攻击聂元梓、攻击聂元梓兄妹的革命家庭，并罪及聂元梓老母亲和整个家族的宣传品。传单充分表明，作者不仅对聂元梓有着刻骨的仇恨，而且株连到整个聂氏家族。为什么对聂元梓要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传单出版之时，关锋、王力已经垮台，戚本禹时日无多，他们的爪牙已纷纷落网，学部联队也已土崩瓦解。那么，这份传单还代表着哪些人和哪些势力对聂元梓这么仇恨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实证明，关锋、王力的垮台和即将到来的戚本禹的垮台，非但没有解决王、关、戚等人搞极“左”和结党营私给文革造成的破坏问题，没有改善文革两派恶斗的政治生态，相反，文革的形势实际上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恶化。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笔者能够说得清楚的。本文仅就北大井冈山同王、关、戚有没有关系的问题略作探讨。

笔者在该传单“评聂元梓的谣言攻势”一文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至于我们井冈山的一些负责同志，的确同当时披着群众组织负责人外衣的洪涛、刘郢、王恩宇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这如同当时同其他许多群众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见过面、谈过话一样普通又寻常，光明且正大。固然没有能够及时识破王恩宇、洪涛的反革命面目，是严重的错误。对这一错误，我们兵团的负责人早已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

这段文字表明，文章作者尽管遮遮掩掩，扭扭捏捏，还是难得地承认了北大井冈山的领导层同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也承认了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是“披着群众组织负责人外衣”的反革命，因而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过，他们“早已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了。

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到底犯了什么样的“严重的错误”？他们又作了什么样的“认真

的自我批评”？文章对此讳莫如深，却声称“普通又寻常，光明且正大”，既然如此普通寻常，如此光明正大，那么，又有什么错误可言呢？又为什么从未公布于众呢？陈、林二校友是否听到过你们领导人的“认真的自我批评”呢？如果听到过，现在可否向读者们传达一二呢？

问题的关键是，洪涛、刘郅、王恩宇是什么人物？他们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的头头，而是王、关、戚的爪牙，是吴传启这个团伙中的干将，在1967年初至8月底这七八个月里，曾经是北京文革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

洪涛是学部民族研究所的，刘郅是统战部一个司局级干部。1967年初，洪、刘二人控制了民委统战系统的一派群众组织，是吴传启一伙在民委统战系统的代理人。他们还是1.15抢档案事件的主犯，抢劫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的大量机密档案，开启了北京市打、砸、抢国家档案的先例。洪涛、刘郅本来已经被公安部扣押起来了，周总理也作出了追回档案的指示。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都曾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严佑民还指出，“这个事件本身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在吴传启的运作下，在关锋的干预下，在谢富治的包庇下，洪涛、刘郅在第二天就被释放了，不但被释放了，他们还获得了一份丹书铁券——由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的《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这份“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颠倒黑白，把抢档案的人封为“左派”，把抢档案称为“接管档案”，而且是“革命行动”。洪涛、刘郅从公安部出来后，宣称谢副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向他们“道歉”、“表示慰问”，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扣留是非法的”，谢富治还说“公安部要发表声明”，而且由洪涛“自己写”。¹显然，这份“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就是洪涛自己的作品。我们就拿这一件事来看，洪涛、刘郅有多厉害吧？他们的能量有多大吧？因为这是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阴谋团伙，

¹ 参见新北大公社独立寒秋战斗队编：《首都高校两派矛盾的由来、发展和关锋、王力有关讲话》，1967年9月。

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洪涛、刘郢在这个团伙中间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洪涛、刘郢如果真的受到查处，会引起连锁反应，必将危及这个团伙刚刚建立起来的网络。当时的一则传言说，1.15事件的当天晚上，“吴传启一夜没睡，守着两个电话，看洪涛、刘郢出来了没有”，还有一则传言说，“洪涛、刘郢是通过吴传启、穆欣、关锋（出来的），是关锋打电话叫公安部放的”。¹当时的传言，实际上是真事。看看，这两个人厉害吧！

在“反二月逆流”的浪潮中，洪涛、刘郢联名贴出攻击李富春副总理的大字报，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为什么不用群众组织的名义，而是自己跳出来呢？是群众组织不支持他们呢？还是他们认为这样能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呢？洪涛还是4.8民族宫事件的幕后挑动者和现场指挥者。洪涛被抓后，向新北大公社供认，民族宫武斗时，他就在那里指挥。洪涛同湖南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头头张家政有密切关系，张家政在北京活动，就住在洪涛控制的民族研究所里。张家政在那里写了一份陷害周总理的材料，随后，该材料由戚本禹派人取走。湖南省军区执行中央文革“2.4批示”时意外发现了“湘江风雷”头头陷害周总理一案。在查办此案时，他们派人来北京调查洪涛，但调查竟然在公安部受阻——然而，调查人员在《新北大》上看到了孙蓬一的4.12讲话，看到孙蓬一点了洪涛的名字，他们找到北大。——这也就是后来新北大公社得以参与此案调查的缘由。总之，洪涛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物，也是吴传启团伙中最猖狂、最能惹事的人物。

王恩宇是“学部联队”台面上的第一把手，是个年轻人，头几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吴传启、林聿时极力拉拢王恩宇而自己在幕后指挥。学部联队的《进军报》，刊头题字是王恩宇的手笔。王恩宇后来讲，这是吴传启、林聿时为拉拢他而坚持要他写的。否则，学部有的是书法大家，哪里轮得上王恩宇来写。吴传启、林聿时外逃期间，由王恩宇奔波联络，王还在学部为他们募集全国粮票。王恩宇同戚本禹的关系极为密切，戚还派王去中央档案馆当军代表，并许诺王：“《毛泽东传》，将来就由你来写”，以示拉拢。关锋、王力倒台后，王恩宇向学部群众组织交待的，全是他同戚本禹的来往。这让旁听这次会议的

¹参见新北大公社独立寒秋战斗队编：《首都高校两派矛盾的由来、发展和关锋、王力有关讲话》，1967年9月。

北大同学深感震惊。

以上有关王恩宇的事情，均系这位参加旁听的校友所告。由哲学社会科学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队、六一公社、718 联总、红色造反者出版的报纸《长城》第六期(1968 年 2 月 19 日)，刊登了学部红卫兵总队野战兵团、工代会学部红色造反者长城兵团的文章《历史宣判了戚本禹的死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还把反革命分子王恩宇安插到中央××馆当军代表，扬言王犯去写党史和毛泽东传，真是罪该万死！”这可以算是一件旁证。

这些人同谭厚兰、林杰、关锋的妻子周英、周景方等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网络很大，他们的黑手无处不在。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逃亡外地后，学部联队的事就由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负责打理。

洪涛、刘郢、王恩宇后来都被抓起来了，文章作者也承认他们是“披着群众组织负责人外衣”的“反革命”，同这一伙“反革命”的往来，真的是那么“普通寻常”、“光明正大”么？是不是应该向大家说说清楚，并且给后人一个交代呢？

反之，同聂元梓有密切往来的人，如果有那么几个被抓了起来，北大井冈山还不就闹



翻天了。这里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引用的传单。传单上有一篇文章：《评聂元梓谣言攻势的政治背景》。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正在井冈山人紧张战斗的时候，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变：聂真被捕了！聂元素被捕了！郑家店倒闭了！周达甫完蛋了！”

聂真是聂元梓的哥哥，聂元素是聂元梓的姐姐。郑家店是指郑公盾和郑仲兵父子。郑仲兵在 1.15 事件中，坚决保护档案，被洪涛一伙以冲公安部，迫害左派为名抓进公安部。“郑家店倒闭了”，是说郑公盾被捕，这和聂元

(图一) 梓有什么关系？周达甫是民族学院的教授，其妻子为北大俄语系教员，与聂元梓曾住在一栋楼。就因为亲属和邻居等关系，就把他们和聂元梓联系起来。他们和聂

元梓在北大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当时这些人被捕的原因各异，他们几个人后来都没有问题。拿亲属和邻居等做文章，除了发泄仇恨，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不是单方面的，事关双方。为什么谈得拢呢？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没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能谈到一起去吗？北大井冈山的革命小将，同这几个“反革命”之间，有什么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呢？他们之间，仅仅是见面和谈话吗？这几个“反革命”向北大反对派提供的物质支持少吗？北大反对派又向这几个“反革命”提供了什么呢？洪涛、刘郢、王恩宇这些人为什么要把手伸向北大？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伸向北大？为什么要和“团零飘井红”及后来的井冈山兵团联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团零飘井红”及后来建立的“北大井冈山兵团”在北大起什么作用？这都是需要搞清的问题。

有必要再回顾一下当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中央文革，面见江青、陈伯达，揭发关锋、王力、吴传启、卢正义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结党营私”。聂、孙当时对戚本禹还缺乏认识，同意戚参加这次会见，但坚决拒绝关锋、王力参加。聂、孙揭发的问题，基本上在孙蓬一的4.12讲话中都提到了，只不过没有点关锋、王力的名而已。在这次会见中，戚本禹极力为关锋、王力辩解，从而表明他和关锋、王力实际上是一伙的，聂、孙由此对戚本禹也有了新的认识。孙蓬一的4.12讲话点了周景方的名，实际上指向了戚本禹，因为周景方就是戚本禹的代表，只是老百姓不知道罢了。

从1967年4月下旬开始，新北大公社就开始用大字报来揭露批判这个团伙的某些成员。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许多高校和一些国家机关的群众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也发现了问题，看出了这个团伙的野心，他们对这个团伙的嚣张气焰也早有不滿。在反对王、关、戚的问题上，北大并不是孤立的。只是孙蓬一的4.12讲话开了这个头，北大成了领跑者，也就成了这个团伙竭尽全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不能说聂、孙对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

性和危险性没有认识，但认识远远不够，致使北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斗争策略上，聂、孙、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把控得还是比较到位的。鉴于文革大局，当时不可能公开把矛头直接指向关锋、王力，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吴传启绝对是关锋和这个团伙的要害和软肋。在当年的文革江湖上，只要把矛头对准吴传启，大家都知道这绝对是针对关锋的。而且，在发动这场斗争之前，聂、孙已经向毛泽东的文革指挥部——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作过汇报了。相信这也会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去。而在4月10日的会见中，江青已经不像头一年为吴传启的事同陶铸发生激烈争吵那样，不再坚持“吴传启是左派”，而是改口说“要划清界限”了。

关锋、王力、戚本禹心中是有鬼的，结党营私的罪恶使他们不敢、也不肯同吴传启等人切割。此前，由于卢正义确有历史问题，他们已暗中同卢正义切割，让卢正义“失踪”了。这次，他们想故伎重演，让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三人到外地躲避，然后放风说，他们已经不在北京了。言外之意就是：现在北京的事情同吴传启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们再搞，就是反中央文革。他们很希望反吴传启的力量发生错误，把矛头指向关锋，然后他们就可以像过去镇压学部总队那样，把反对者统统镇压下去了。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梦想没有实现。聂、孙可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指控关锋、王力“结党营私”，但绝不会在大字报上这样写。向江青、陈伯达面陈意见已经足够了，根本不需要公开向关锋开火。

在让吴传启等头面人物从舞台上“消失”的同时，王、关、戚也把手伸向北大，力图在北大制造内乱，从北大内部把聂、孙搞下去。所幸北大内部不缺少反对派，而且他们一直在寻找“倒聂”的机会，这是王、关、戚的天然盟友，不用费神寻找，他们自己会找上门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真是一条铁律。北大的反对派从孙蓬一的4.12讲话里就可以找到朋友，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虽然外逃了，但洪涛、刘郢、王恩宇还活跃在前台，好找得很。至于王、关、戚，他们高居中枢，操控四方，根本不需要和“团零飘井红”直接打交道，他们在幕后打发几个二流爪牙如洪涛、刘郢、王恩宇出面，再加一个中央文革记者张超，就足够玩转那几个头头了。“团零飘井红”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不过是被

他们利用来搞乱北大、保护潘、吴，保护王、关、戚罢了。所以，“陈文”认为“团零飘井红”和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没有直接来往，因而“没有一毛钱关系”，真是把自己的档次看得太高了。至于牛辉林、侯汉清等人要找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也是因为这是一条通往王、关、戚的捷径。双方互有需要，故而一拍即合，互相利用。

王、关、戚用得着公开讲话支持“团零飘井红”或井冈山兵团吗？他们敢这样公开讲话吗？他们有资格在北大公开这样讲话吗？他们是真的关心和支持“团零飘井红”或井冈山兵团吗？真的有能力打倒聂元梓和校文革而让井冈山兵团取而代之吗？危机早已来临，王、关、戚和王恩宇等人想起过向北大井冈山兵团打一声招呼吗？

王、关、戚真正关注的，也真正担心的，其实是吴传启。吴的历史问题，在头一年江青和陶铸大吵大闹的时候，早就被翻出来了，有些问题档案里就有，中央文革的人都是知道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真的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更没想到北大真的到武汉档案馆去作了调查。1967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新北大公社揭发批判潘梓年，时间约1个月，那时王、关、戚还坐得住，因为潘梓年只是他们捧出来的一个“牌位”，并非要害，是随时都可以抛弃的。他们认为北大批判潘梓年只是一个“陪衬”。到了5月底，他们眼看北大批判潘梓年已告一段落，估计北大下一步要公布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了，这是要害，于是就坐不住了。他们先是提出来要和聂元梓“合作”，条件是不要公布吴传启的材料。¹他们真的打算和聂元梓做一笔政治交易吗？不会的，他们的目的是先把北大压住，争取时间，然后自己来做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调查。但聂元梓拒绝“合作”，并很快公布了材料，这样就彻底撕破了脸皮。于是，陈伯达的6.5讲话来了，大棒子打下来了。倘若没有这根大棒子，北大继续公布材料，材料终究有限，过一阵子也就用完了。吴传启又不是北大的人，北大既没有处置他的权力，也不能代表组织上给他下结论，不过贴贴大字报、开开批判会罢了。说到底，还是王、关、戚做贼心虚，生怕他们这个团伙散了摊子，生怕他们费尽心力搭建起来的这个网络垮了台。直到67年8月中旬，王、关、戚、林杰等人自身已面

¹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19、220页。

临严重危机，关锋、戚本禹于8月16日对学部《农民战争史》编写组成员讲话的时候，才表示了和吴传启“切割”的意思，准备抛弃吴传启了。¹而这时，恰恰是北大井冈山兵团闹得最欢最凶的时候。出大力气保了两个多月的关锋、王力即将垮台，北大井冈山兵团还蒙在鼓里，这真是悲哀。

北大的这些反对派，究竟和王、关、戚有没有关系，首先要看政治立场。站队是很重要的，他们无疑站在了王、关、戚一边，广播喇叭里声讨聂、孙“分裂中央文革”的口号响彻北大校园，声讨聂、孙“分裂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大吵大闹了足足两个多月，怎么就不记得了？这算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毛钱”的问题，是无价的。

1967年8月31日发表的井冈山兵团七纵“长缨在手”战斗队的文章《斩断伸向中央的这只黑手》，²表达了直至这一天为止的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立场。文中写道：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她（指聂元梓——引者注）抛出所谓“揪出新的黑线”的反动论调，扬言“只出来一个陶铸嘛”，要揪出“新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抛开主席指出的大方向，企图重搞一个资产阶级的方向；她自称“江青派”、分裂中央文革，在全市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混乱；她以“林杰—关锋—康生”的反动逻辑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她一手炮制了什么“摘桃派”的理论，为其全面夺取市革委会大权制造反动舆论，并直接策划了炮打谢副总理的罪恶活动……

文章谴责聂元梓“分裂中央文革，在全市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混乱”，谴责聂

¹ 1967年8月16日晚，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傅崇兰等《农民战争史》编写组成员，谈到吴传启问题，关锋说：“我是57年反右以后才认识吴传启的，曾同他一起写文章，用撒仁兴的名字。对他的历史不了解也没有办法了解他，我没有权利去看他的档案，他的历史问题可以调查，也应该调查，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能说反对吴传启就是反对关锋。”戚本禹说：“吴传启的问题，按关锋同志说的去做。他（指吴传启）写过文章，58年写了些文章，还可以的嘛。（另一记录：他写过好的文章）海瑞罢官，他也写的嘛。当然他的文章也有问题，也可以批评，他的历史问题也可以调查。”参见《关锋、戚本禹对“农民战争史”编写组成员的讲话》，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² 载《新北大报》和《新人大》合刊，1967年8月31日。

元梓以“林杰—关锋—康生”的反动逻辑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从极“左”或极右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总之是不可饶恕。这篇文章表明北大井冈山兵团是坚决反对聂元梓这样做的，再次表明了他们站在关锋、王力一边的坚定立场。他们和关锋、王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疑问呢？在广大群众已经认识到关锋、王力的真面目，起来同他们作斗争时，北大井冈山兵团挺身而出，坚决保卫关锋、王力，他们是关、王的忠实支持者和盟友，这还有疑问吗？这篇文章本来想一举把聂元梓打成反王、关、戚的“黑手”，不料文章发表之前，真正的“黑手”已经被抓了。“伸向中央的黑手”竟然不是聂元梓，而是关锋、王力一伙。这是文章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悲啊，关锋、王力已经被抓了，而那些被陈伯达“6.5讲话”搞昏了头的人，还迷失在王、关、戚制造的迷雾中，沉缅于自己制造的舆论和幻想中，处在吴传启的手下王恩宇、洪涛等人的误导下。他们对于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变化征兆茫然无知，自己身后的黑手已经被抓，却还在那里抓别人的黑手。

无独有偶，北师大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的表现也是如此。1967年9月1日晚，谭厚兰在师大革委会的会议上还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还率人到《红旗》杂志社示威，表示支持林杰。北师大革委会和师大井冈山公社9月1日发表的《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有的话同《新北大报》上述文章如出一辙：“运动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一直把林杰—关锋—康老，说成是一条黑线，妄图分裂中央文革……”。¹

同样的文章还有署名“多思”战斗队的《三十五个为什么？》，发表在1967年8月25日的《新北大报》上，也是想把聂元梓打成“黑手”的，也同样表明了他们同关锋、王力站在一起的立场。为免读者查阅之劳，笔者在这里摘录其中4个：

1、为什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聂元梓、孙蓬一煽动数千群众炮打谢副总理？为什么与此同时北大出现了炮打、影射关锋、林杰的大字报？

2、为什么北大的一个普通校刊编辑吴子勇能绘出触目惊心的反革命“四月形势图”？在反革命“四月形势图”中列出了一股来自中央文革，另一股来自中央军委的所谓的“反

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第613页。

新北大逆流”这又说明了什么？（引者注：吴子勇的《四月形势图》列出的“反新北大逆流”的外部结构，在师大的上面画的是—××—××—××。吴子勇并未写明指什么人，但读者都明白，第一个××指的是林杰，第二个××是关锋，第三个××是康生。康生在1967年9月16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派的会议上说：我成了地派的后台了。不是瞎说，有图为证嘛！就是指吴子勇的《四月形势图》。吴子勇写该大字报，其做法并不可取，但这种说法并非其首创，在民间早有流传，其源头，或许就是康生本人1966年在北师大的公开讲话。）

3、聂、孙在北京大搞微不足道的人物吴传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陈伯达同志说：“以为利用吴，一下子打中了，可以把报纸中央的权夺过来了”？（引者注：吴传启既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为什么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呢？新北大公社为什么就不能贴他的大字报呢？揭发吴传启的大字报，到6月1日刚刚贴出一份，陈伯达为什么就坐不住了，6月5日就迫不及待地抡起大棒了呢？《新北大报》的这篇文章，其站在关锋、吴传启一边的立场不是昭然若揭吗？文章所引陈伯达的指责，完全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中央报刊的大权，早已落在王、关、戚手中，《北京日报》也受到吴传启的控制，但他们并不满足，到1967年4月，他们又借“大批判”之名，鼓动吴传启一伙在中央报纸上发表文章，夺取话语权，并借此“亮相”，以窃取更多的权力。¹ 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揭发吴传启，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和黄粱美梦，这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对聂、孙和新北大公社仇恨之深，也就不难理解了。）

4、为什么聂元梓一定要打倒李雪峰、徐非光、刘郢、洪涛？她为什么对华北局，高教

¹ 孟祥才著《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揭示，1967年4月某天上午，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集了一个部署大批判的会议，到会二三十人，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傅崇兰等人均参加了。戚本禹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可是不少报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必须将这个形势扭转过来，大家写文章。吴传启、林聿时，还有傅崇兰，你们都赶快亮相。”孟祥才的文章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31/09/99333_263356613.shtml。另据曾旁听王恩宇交待的北大校友告，王恩宇提到，1967年4月初一天夜里，关锋、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吴传启、林聿时，谈论在中央文革下设立宣传组一事，并拟将吴、林二人调入宣传组。其时《人民日报》的人来送报纸大样，待王力审阅、签字，报纸即可开机印刷。关锋、王力对《人民日报》的人说：“你们不是缺文章吗？就找他们（吴、林）要嘛。”1967年4月初，正是王、关、戚、吴一伙开始进一步扩张的时候，但这一进程因为意外发生的“4.8民族宫事件”和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而受阻，形势的发展也不是王、关、戚所能操控的了了。

部、民委统战系统这么感兴趣、花力气？（引者注：洪涛、刘郢，上文已经说过了。徐非光是卢正义的盟友，也是同吴传启一伙站在一起的，但自卢正义“失踪”后，徐已不再是北大关注的主要目标了。北大对李雪峰的批判，仅限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孙认识到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的问题后，关注方向已转向这一团伙，而李雪峰同该团伙毫不相干。文章作者在此处将李雪峰扯进来，足见其思维混乱，用心不良。）

《新北大报》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和思路很值得研究，但现在考证起来非常困难。笔者很希望作者能给出一份详细的答案，可惜未能等到。因为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两天，关锋、王力、林杰一伙要垮台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而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次日，亦即8月26日，关锋、王力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下台了。如果有知情人了解这“三十五个为什么”背后预定的答案，现在发表出来，也很有价值。据说文章作者就是牛辉林，无从证实，谨望了解情况的人能给予解释。

和王、关、戚有没有关系，除了看立场和站队，还要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关锋、王力垮台，吴传启、林聿时、洪涛、刘郢等人束手就擒，学部联队顷刻瓦解，被蒙骗的人们揭发了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个团伙利用某些人搞乱北大的问题。《新北大》发表的《牛辉林之流就是林杰反党集团的马前卒》¹一文搜集了39个事例，笔者现摘要选取其中10例，按时间顺序排列，来看看谁和谁“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他们有什么样的目的，他们的谈话有哪些主题。

1. 今年四月份以来，洪涛之流和牛辉林们的勾结日益紧密。他们派学部赵××，汤××，赵×与新北大联系……。五月份牛辉林和一个女的找洪涛，汇报他为什么“造反”，“分歧从何而来”等等，和洪涛之流密谋策划，如何“造反”。洪涛和牛谈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表示愿意帮牛整材料，负责上报。果然牛辉林们就通过统战民委联委上报材料。（引者注：另有材料表明，“红旗飘”的吴××曾多次去洪涛特设的“北大动态组”请示汇报，该“动态组”还为“红旗飘”代印“造反宣言”、“致敬信”和各种传单。）

¹ 载《新北大》，1967年12月6日。

2. 五月份的一个晚上，徐运朴准备“造反”前去请示王恩宇。王恩宇拼命给徐打气说：“坚决干，我们支持你，态度再明朗些，要干就要大干。”（引者注：这是陈伯达 6.5 讲话以前的事。徐运朴要造校文革的反，为什么要找王恩宇请示？显然，他知道王恩宇是通往王、关、戚的一条渠道。另有材料表明，此次会见，洪涛也在场，徐运朴“造反”底气不足，情绪不高，王恩宇、洪涛便极力给他鼓劲、打气。）

3. 五月六日，由民院东方红领牛辉林和唐×（女的）找到洪涛，把所谓“聂元梓五·四秘密讲话”一份，送给洪涛。（引者注：这也是陈伯达 6.5 讲话以前的事。另有材料表明，当时刘郅也在场，双方谈话约 2 小时。）

4. 七月上旬，李××把侯汉清带到了学部。就北大的问题请示洪涛。侯向洪涛汇报了：北京公社人多，要翻井、红、孔、杨之案。（引者注：侯汉清为什么要向洪涛请示？因为这也是通往王、关、戚的渠道。）

5. 七月份，牛辉林们在北大大饭厅开会时，王恩宇来北大，见牛辉林正在讲话。后来由李××介绍，他们在门口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6. 七月下旬一个晚上 12 点多，由洪涛给刘郅打电话，由刘郅在社会主义学院要一辆车，把牛辉林送回学校。（引者注：在洪涛、刘郅心目中，牛辉林的作用非同一般，是要有这般礼遇的。）

7. 八月十六日，牛辉林找到洪涛攻击“4587 部队在北大军训支保，在石家庄支保”，攻击北京军区，还谈了东北“问题”。（引者注：牛辉林反聂，是要连军训解放军一起反的，不仅反这支部队在北大的军训，还要反这支部队在石家庄的支左工作，甚至要涉及北京军区。）

8. 林杰反党集团说：“我们认为反潘吴只是一种手段，实际上就是反××。吴的材料越调查越左派。”怪不得洪涛说：“北大井冈山的头头，在新北大反潘、吴时是支持学部联队的，是保潘、吴的。他们保潘、吴，就是在校内反聂，把聂元梓一派搞垮，即是保潘、吴。”（引者注：洪涛此言，说明了北大内部“反聂”的重要作用。另一材料表明，洪涛

于8月16日在民族研究所对牛辉林说了同样意思的话：“你们保潘、吴就是在校内反聂，反聂就是保潘、吴，把聂元梓这一派搞垮了，就是保潘、吴。”）

9.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了“关于十七次秘密会议的串联会”。牛辉林代表井冈山出席了会议。王恩宇、刘郢、洪涛等人决定马上公布“十七次秘密会议记录”，加上他们所写的“按语”。果然很快就在北大公布了这份“记录”和“按语”。（引者注：民院东方红抄了对立派一个头头的家，抄到一个工作笔记，上面有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公社等单位，研究反潘、吴事项的17次会议记录。他们公布这份“记录”并加“按语”，本来是计划借此大做文章，掀起一场大风波的，但那时关锋、王力、林杰等人已陷入危机，据说关锋妻子周英打电话指示王恩宇叫停了这件事情，不让扩大。数天后，关、王等垮台，“记录”和“按语”再无人提起。据笔者所知，反潘、吴的联席会议确实开过多次，但每次与会者并不相同，也未必都作记录，一个人有17次会议记录，实属罕见。若有人保存有此“记录”及“按语”，当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0. 九月×日上午，牛辉林和王恩宇一起议论：“××（引者注：指关锋）出了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这10条很不全面，也不详细，但可以说明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来哲。

除了洪涛、刘郢、王恩宇等人之外，想要搞乱北大的势力还有很多，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班子来搜集北大的情况，向王、关、戚上报了许多材料，他们同北大某些人的联系，一起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有那位张超女士所做的不符合记者身份的事情，被群众举报的就有不少。限于篇幅，也限于笔者现在无法考证那些事情，就不赘述了。笔者相信，将来的学者，一定会因为材料太多、头绪太乱而备感困扰。

事实上，井冈山兵团的领导层和王、关、戚及其爪牙们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对北大井冈山产生了什么影响，井冈山人自己倒是真应该搞搞清楚——许多井冈山的群众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他们最有条件搞清楚——这对总结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北大历史是有益的。■

【怀人】

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丁向阳¹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64级力学二班有37位同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位同学意外亡故。他们是王建鑫（又名王建新）、周善丰。2014年我们年级在编写入学北大50周年的纪念册中对他们作了如下描述：

王建鑫

浙江温州人。

1946年3月10日出生。

1964年浙江省温州一中高中毕业。

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曾任班学习委员、团支部宣传委员，是校乒乓球队队员。

1967年8月15日在温州武斗时被抢击身亡。

周善丰

广西玉林人。

1945年11月27日出生。

1964年广西博白龙潭中学高中毕业。

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

1973年5月12日自刎身亡。

¹ 丁向阳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64级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至云南省国防工办“三线”工厂，1983年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2007年退休前任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总工程师。

一个班级在文革中有两位同学意外亡故，在全校也是罕见的。王建鑫的情况已有我班的张若京同学写了一篇“王建鑫温州遇难的前前后后”，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在1967年9月末的北京大学，北大“井冈山”的大喇叭里一直震耳欲聋地响着“向王建鑫烈士学习！”的口号声，王建鑫的名字在当时的北大应该是无人不晓。周善丰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周善丰性格比较内向、文静，高高的个子，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文革中搞大批判时由于他文笔好，经常代表小组或班级写大批判发言稿和文章。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1月18日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北大校文革派人去高教部夺权，当时在西单的大木仓胡同有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但文革中两个部在一起搞运动。高教部有以卢正义、徐非光为首的“延安公社”、教育部有以中下层干部和工人为主的“北京公社”。这两个群众组织在观点上是互相对立的。“延安公社”的头头卢正义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但有政治历史问题，他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的出版物上写过一首名为《转变》的诗：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丛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现在看来这首诗还挺有文采，就因为这首诗，卢正义被打成了“叛徒”。徐非光是高教部的一位处级干部，1965年参加过北大的社教，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等“左派”认为他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叛徒”（被北大“左派”指为叛徒的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原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平）。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一派的“井冈山”和社会科学学部以潘梓年、吴传启为首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是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北大是反对“延安公社”、支持“北京公社”的。北大校文革派了一批人马去教育部夺权，我们班的周善丰、李德鸿和我受系文革派遣坐了大卡车跟着去了教育部，当时参加教育部夺权完全是校文革官方组织的。这是我第一次进教育部的大门，一座像北大的西校门一样的宫殿式大门。所谓夺权就是“北京公社”把他们收集来的教育部大印（教育部印和各司局的印）交给了北大来夺权的人，北大在教育部的院子里支起的大喇叭宣布“夺权成功”。当时局面也极混乱，一口袋大印怎么办呢？北大去夺权的头头觉得我们数力系的三个小伙子还挺精干，于是就吧这一口袋大印让我们班的李德鸿同学用一个书包背着，周善丰和我就守在左右寸步不离地保护着他和大印，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口袋大印整天担惊受怕，生怕对方派人来抢。白天院里的大喇叭里整天播放“夺权声明”、播放卢正义的那首诗、播放“打倒叛徒卢正义、徐非光”的口号，所以我对那首诗的印象极其深刻。晚上我们就睡在原来部长办公室的大皮沙发上。后来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在高教部搞了反夺权。2月2日下午，关锋、王力打电话批评北大，北大的夺权大军才撤出了教育部，教育部的大印还给了教育部“北京公社”，我们三个人总算卸下了肩上的担子，轻松了。

高教部夺权事件后，北京高校逐渐分裂成了两大派：以北大“新北大公社”和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及以北师大“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

回到学校后不久，校文革指派参加高教部夺权的哲学系青年教师赵建文出面组建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参加过教育部夺权的周善丰也加入了“除隐患战斗队”。当时“除隐患战斗队”的主要目标是从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入手，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潘梓年、吴传启的材料，因为他们都是一派的。打倒潘梓年、吴传启，把矛头直指他们背后的后台林杰、王力、关锋、戚本禹。当时“除隐患战斗队”是“新北大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两派斗争的笔杆子、“文攻”的主力军。1967年9月王、关、戚倒台了，但“除隐患战斗队”并没有解散，有人说聂元梓“炮打谢富治副总理”，怀疑“除隐患战斗队”在整谢富治的黑材料，当时谢富治还炙手可热，谁也不承认“炮打谢富治”的事。周善丰在班里从来不谈论在“除隐患”的事，每天匆匆忙忙地去“除隐患战斗队”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宿舍。我和周善丰虽然同属一派、同住一个寝室，生活方面无话不谈，但他从不说“除隐患”的事，显得很神秘的样子，看来保密意识还挺强。所以我对他在那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也一无所知。直到1968年9月北京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北大，北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解散时，周善丰才回到班级参加运动。周善丰是个白面书生，君子动口不动手，在文革中他虽然是“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一点与武斗相关的事。在北大文革武斗期间，我们班的两派同学在校内外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有激进、有保守，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在班内都能和睦相处，帮对方的同学拿行李提供方便。所以我们班同学在几十年后再相聚时能一笑泯恩怨。

1970年3月毕业时，周善丰被分配留校工作，按说毕业能分配留校是很不错的去向。当时力学系在汉中653分校，他也就留在了汉中。他进了力学系的流体力学教研室。一边由老教师帮着补一些文革中落下的专业课，一边给新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补基础课，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的。但好景不长，北大是个是非之地，1973年文革的风暴还是刮个不停。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尽管汉中相比北京运动的烈度并不算太大，但北京的风暴还是刮到了汉中653分校，三月份653分校播放了北大在北京批斗所谓‘五·一六’份子的录音，迟群和北大校党委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开除党籍。周

善丰听了以后震动很大，惶恐不安。当时我们班其他留校的同学很关心他、和他谈心，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紧张，后来那位同学出差外地两个多月就没有机会再和他沟通了。周善丰脆弱的神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点绷不住了，整天疑神疑鬼地以为别人要整自己。1973年5月12日中午，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拿起小刀割了自己的脖子。当他把气管割破、血流了一地，血流出了门外才被其他老师发现，喊人帮忙急救，周善丰因为气管破了，痛苦万分。由于汉中分校医务所的条件太差，护士只是把他的伤口稍微处理了一下，插上了一小根管子暂时维持生命，然后用一辆汽车把他往30公里外的汉中市医院送，送到县医院时那根插在气管里的管子在路途中被颠掉了，周善丰已经气绝身亡，永远离开了人世。



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文攻武卫”。1967年8月王建鑫作为北大“井冈山”的一名战士，去温州支持造反派，到了两派武斗的现场，不幸在“武卫”中遇难，他可能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位意外亡故的学生。周善丰参加文革的“大批判”写写文章、整整材料，按说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他精神上太投入了，钻进了路线斗争的牛角尖不能自拔，1973年

（1967年9月，北京大学某群众组织纪念王建鑫大会的主席台一角）5月最终在“文攻”的余波中精神崩溃而自绝了生命，他可能是北大文革中最后一位意外亡故的学生。王建鑫、周善丰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没有文革他们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对于王建鑫、周善丰的意外亡故究竟谁应该负责呢？我想对于周善丰的死，当年组建“除隐患战斗队”的校文革聂元梓要负一定的责任，没有“除隐患战斗队”，周善丰就不会陷入“路线斗争”、“文攻”的深深漩涡，以致不能自拔而自绝生命。对于王建鑫的意

外亡故，当年派王建鑫、周瑞清去温州支持造反派的北大“井冈山”某些头头要负一定的责任。其实当时已经停止串联，中央和各级领导都三令五申“就地闹革命”。那些不负责任的头头以支持外地“造反派”的名义，把无知的青年学生驱入了死亡的深渊，最后只是给王建鑫戴上了一顶“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见1967年9月26日新北大报第二版）的“烈士”高帽子。当然最应该负责的是文化大革命“文攻武卫”的始作俑者。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王建鑫、周善丰的意外亡故，回顾王建鑫、周善丰的鲜血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反思吗！

王建鑫和周善丰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属北大不同的两派，在校内外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也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忠于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他们都年轻、聪明、善良、执着，对信仰专注，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辩起来会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他们都认为自己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对立面看作“反动路线”、攻其一点“无限上纲”。他们在文革中太投入了，以致于置生命于不顾，王建鑫会拿起枪出现在危险万分的“武卫”现场，周善丰会为了路线斗争“文攻”的理想了断自己的生命。他们都认为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献身。但实际上他们都上当受骗了，成了文化大革命“文攻武卫”罪恶口号的牺牲品，在二十多岁的青春年代就早早地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说起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们每一位参与文革的北大同学何尚不是牺牲品！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的教育停滞了十年，这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还照常开办着。文革中北大同学停课闹革命，搞大串联、贴大字报荒废了学业，最终没有拿到毕业文凭就被赶出了北大，我们班两派大多数的同学都被发配到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远离家乡的农村、农场或工厂等最基层的单位，我被分配去了云南山沟里的国防工厂。在文革的十年中，我们参与、我们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我们浪费了十年宝贵的青春！

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和考研制度，我们班有10位同学从全国各地回北大“回炉进修”、有7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13位同学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

当上了教授，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王建鑫、周善丰不是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一定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50年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也已经40年了。但北大还有不少原来两派的同学仍没有完全抛弃文革的思维方式，说来说去还是当初自己一派如何“正确”、对立面如何的“不是”，抓住对立面的一些细节问题纠缠不休，为文革中的一些“激进分子”鸣冤叫屈、歌功颂德。其实就是这些文革中两派的“激进分子”把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发生流血冲突，他们自己也不同程度地自食苦果。回顾王建鑫、周善丰的鲜血、想想我们能侥幸生活在当下的幸福，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呢？

2014年，在纪念北大数学力学系64级力学二班入学北大50周年的同学聚会时，我们班的张文同学写了两首诗来悼念他们，抄录如下。

悼王建鑫

建鑫聪明又坚执，学海暂露鸿鹄翼。
怀抱真情身许国，书生哪里懂政治。
本是血雨腥风场，热血青年作儿戏。
可惜温州一才子，荒沙一丘风流逝。

悼周善丰

善丰与我同室居，家境贫寒无所依。
体貌修长心灵善，文革风浪走不出。
可叹一位好青年，褒河边上早安息。
每逢念及周君事，一袭悲凉情唏嘘。

2017年2月19日

定稿于北京

【怀人】

王建鑫温州遇难的前前后后

张若京¹

1964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分到力学二班，班级的代码是01645。刚入学，我住的第一间宿舍是28斋362室。在三楼的东北角，有一扇北窗。两张双层床，住四个人。我住下铺，王建鑫住我上铺。



王建鑫在文化革命中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王建新，显然有立志图新的意思。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风尚，许多人因为嫌自己的名字有“封资修”的含义或者不够革命，都改了自己的名字。

1967年8月13号，王建鑫在他的家乡温州死于两派武斗。事后，他所在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温州松台山建

（北京大学乒乓球校队纪念王建鑫合影）了烈士群墓，据说墓碑有约一百五十个之多。王建鑫以王建新这个名字安息在一块冰冷的墓碑下面。

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已经50年过去了。每每回想，就觉得文化革命前的王建鑫和文化革命后的王建新好像是两个人。前者勤奋好学、成绩拔尖，后者枪林弹雨、誓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王建鑫遇难后，北大派两人赴温州处理善后，我是其中一人。本来，只想把善

¹ 张若京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64级学生，1970年毕业分配在陕西省兴平县通用机械厂，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读研究生、后获博士学位，退休前任同济大学力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事宜讲述清楚，但为了更全面地介绍王建新，我决定还是从讲述王建鑫开始。

王建鑫是温州人，一年四季床上只垫一张草席，草席下面有一床棕垫。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字写得有特点，抓笔也特别。一般人是用拇指和食指的尖端“捏”笔中指在后边顶住，他却是捏紧拳头，笔从食指和中指的第二骨节穿过，拇指只是压在上边而已。他对时间抓得很紧，就连睡觉都好像一躺下去就希望马上睡着那样。记得我一开始对“数学分析”这门主课有些云里雾里，但他似乎已经很有些体会了。经常看见他抱着吉米多维奇的厚厚的习题集在作。他跟我说，数学家苏步青是温州人。他中学时听过苏步青院士到温州作的演讲，说苏曾经做了上万道几何题。看得出，王建鑫把勤奋当作成功的经验。后来，好像清华数理力学系出了一个天才，已经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了。王建鑫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昌平分校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收到过期刊的退稿。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争强好胜的。

入学不久，我和王建鑫都去报名乒乓球校队，都被录取了。当时绝大多数都是直握球拍的中国传统打法，但已经开始重视横握球拍的西方打法了。我一进去，正巧学校要挑选两人改用新打法。又因为打横板要左右开弓，最好个子高些，所以就挑了我和技术物理系的一位同学。从此，我改成了横握球拍的削球打法。每星期有三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和王建鑫都去一体地下室的乒乓房集中训练。进校第二学期，碰到北京高校的乒乓球比赛。王建鑫虽然是左推右攻的传统打法，但侧身快，前三板非常积极主动，打得虎虎生风。给北大拿了好几分，成了主力队员。从第二学年开始，到了昌平分校。宿舍楼的一头有一间大的活动室，里面放了两张球台。我和王建鑫以及数三的两位校队队员一直保持下午课外活动的训练规律。王建鑫进攻，我削球防守。一来一往，回合多多，堪称训练的好搭档。

王建鑫的体育很全面。撑杆跳跳得像模像样。游泳也游得好。他处处要强，但有时超出自身能力。我记得，有一次绕未名湖跑3000米，他因为争创成绩，到终点后竟然吐血，被急送校医院。他在体育上也有弱项，那就是投掷。在官厅水库军训时，我班的一位同学

投手榴弹好像比解放军都厉害，但王建鑫恰好相反。他不但投得极近而且一投就好像肘关节要脱臼一样。

王建鑫喜欢拉二胡。有一次班级活动，要求每个宿舍出节目。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表演了一个快板书，引得哄堂大笑。我和王建鑫也结伴出了一个节目：他拉二胡，我唱白毛女中杨白劳的一段歌曲。

在文革大串连中，王建鑫改名王建新。估计他和北京各高校的温州同乡一起，串连到过温州。应该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对当地的“造反派”推动很大。所以，他后来活跃在温州一派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层中。中央通知停止串连后，王建新短暂地返回到北大。那段时间，我感觉王建新的注意力仍然在他的家乡，和北京温州同乡的来往十分频繁。在和我的几次谈话中都表现出对温州地区的文化革命形势的担心，表示想回去“闹革命”。有一次，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回去。他从来没有和我认真谈过话，像文化革命前流行的“谈心”那样，这一次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久，我就再没有看见他了。

我从校园的广播里知道王建新遇难的消息。时间应该是1967年8月中旬。很快，我们班的某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找到我，让我跟着该组织的学校一级的一位负责人一起到温州去作善后工作。学校的这位负责人姓陈，是国际政治系的，好像是65级的。应该是安徽人。

我跟着陈同学先直飞杭州，找到军分区的有关领导。当时分析走陆路（翻雁荡山）不安全，决定走水路。所以第二天就到上海上了民主18号轮船。给我突出印象的是，快到温州码头时，我周围的几个乘客竟然打开提包，拿出了手枪。气氛骤然紧张。

到了温州才知道，北京的大学生在温州组织了一个北京造反团，主要由温州籍的北京大学生组成。王建新是其中一员。造反团在温州一中里，有一间房间，是独立的平房，里面有几张双层床。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几个成员懒懒散散地或躺或坐在那里。特别扎眼的是，墙角堆放着几支自动或半自动步枪，还有手榴弹。可以看出，当时的温州已经是一个战场了。北京造反团支持的组织占领了市区，对方则控制了郊区，主要是山区。

第二天我们就要求北京造反团帮助我们找人去挖王建新的尸骨。王建新的尸骨埋在那里呢？这还要从温州的武斗说起。1967年8月13号是温州文革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解放军20军的部队强攻进入温州。这导致王建新所在的一派群众组织从固守的市电报大楼被“解救”出来，继而占领了整个市区，而原来占据市区的另一派则退守到了郊区。本来这一天应该是王建新这一派群众组织的“胜利”之日，没想到，他们误以为对方组织已经被彻底消灭，竟然所有“头头”大约7、8人乘坐一辆卡车从市区到郊区去视察。下午，卡车开到牛山附近，遭遇对方伏击。一个头头（我最近才在《百度》上查出他的名字叫庄秋江）在车上被射杀，王建新从车上跳下后中弹身亡。其余头头全部被俘。所幸出事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的饲养场，发觉出事后就有指战员出来处理遗体。摸了王建新的衣袋，发现北大学生证后立即辗转通知北大。所以，王建新的尸骨就埋在牛山附近那个解放军饲养场边上。地点非常准确。问题是，这个地点当时处于对立面的控制区，只能找当地农民去挖。

《燕园风云录》上有文章说王建新是“中伏击被俘后被装在一个麻袋里乱棒打死”，应该是不准确的。

在我们找人挖尸骨的等待时期，有一天下午，北京造反团的人匆忙来找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山展开行动，希望我们也参加。我记得当时非常紧张，因为如果不去就好像胆小逃避革命一样。还是陈同学政治上成熟，他把我拉到一边和我嘀咕了几句，然后以“我们是代表北大来处理遇难同学的善后工作的，没有得到批准，不介入当地活动”为理由，婉拒了。傍晚时分，战斗结束。进山展开行动的一拨人扛着枪回来了，队伍中还押着几个用绳子捆成一串的俘虏。我跑出去看时，路上已经有人群夹道观看。夹道中间只有一人宽，十来个俘虏在地上跪着爬行，在夹道中被拖拽或用枪托猛击。俘虏看上去都似乎未成年，大约是中学生，有好几个女的。两侧人群或者空手打，或者拿东西打。那是真正的暴打，头破血流，哭爹喊娘。我看见王建新的爸爸也在人群中。毕竟是进修学院的教师，打了几下以后退出人群却也不停地叹气。当天晚上我们去北京造反团的房间，想问问细节。刚进门，就看见一个造反团成员（好像是林学院的）在屋里来回踱步，对别人说，快关窗，外面有人

埋伏。当时是夏天，天很热，但其他人还是互相递眼神赶紧关窗，同时安慰他。我们离开时，一个同学送我们，说今天打得激烈，那位同学可能脑子受了刺激。想想北大3.29武斗还只是用长矛和弹弓，我在北大3.29武斗后不久就逃回家了。没想到王建新的胆子这么大。他的家长也胆子这么大，任由他拿枪去“战斗”。真的很难想像，他在8.13之前固守温州电报大楼一两个月的真枪实弹的战斗中是怎么度过每一天的。

很快，找到了一个老乡愿意去挖尸骨。因为除了王建新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当地人（庄秋江）遇难，所以我们买了两个线毯和麻绳，说好挖出一具尸骨付50元人民币。老乡早上去，下午就回来了。回到温州一中。我们去的时候，两个线毯扎成两包已经放在了一间房间的地上。边上有一个扁担，可见是老乡用扁担挑回来的。我带上事先准备好的橡皮手套和口罩，解开了包扎的麻绳（其他人站得远远的看我一人操作，但陈同学在我边上帮忙）。也奇怪，我虽然害怕武斗，但并不害怕死人这些事。尤其是，这里边是王建新的尸骨。包裹里面大量是泥，泥土里有骨头。可能是因为天气热而且温州潮湿，所以都腐烂了，只有骨头，伴有恶臭。我首先就断定一个头颅骨是王建新的，因为王建新的头型特点我很清楚。又看到一段脊椎骨，上面套了一条皮带，是塑料丝编的，黑白条纹斜交编成。因为是塑料的所以没有腐烂。这条皮带我看了眼熟，就问王建新爸爸。他就把王建新的妹妹从屋外叫进来辨认。王建新的妹妹一看见就放声哭起来。原来这是王建新考上北大那年，他妹妹亲手为他编织的。就这样，两位遇难者的尸骨算是确认了，也算是区分开了。两家人分别处理了后事。《百度》上有庄秋江的家人晚辈说，庄秋江的尸骨是他们家人用棉被包裹带回，又根据庄的一条裤衩辨认出来。肯定是误信误传。

以后，北大的该群众组织邀请王建新全家来到学校，组织了追悼会。我们班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校乒乓球队的多数同学也参加了，拍的相片我至今珍藏着，附在后边。

王建新是我们班第一个去世的，可能也是北大文化革命以来第一个去世的同学，而且是以这种方式。真让人嗟叹不已。借此短文纪念他。■

【述 往】

难忘的燕园·1969年（四）

——未婚妻之死

吴 琼

亲爱的读者，在这一章里，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凄惨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包括其中的种种细节完全是真实的。它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它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每每回忆起来便格外伤心……

马明明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在三年高中时期，也就是在1961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与现在不同，由于家庭和学校的严格要求，所以，我和明明只是一般要好的同学，两人之间并没有男女爱情可言。

但是，男女之爱的种子是那样的奇特和神秘，它仿佛很早便钻入了少男少女的心田，然后，才慢慢地发芽、成长并经受多次风霜雪雨的考验，进一步成熟起来。

那还是1961年的10月初，我从北京市区的北京五中初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郊区刚刚建立起来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因为我还不习惯北大附中的集体住校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忍受不了那时刚刚开始“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天天遭到的腹中饥饿的折磨，所以，我找个理由，从北大附中转学，转到了市区离家较近的、故宫和沙滩附近的北京65中。当我到65中报到入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到家里后不久，就有两位65中的同班女生，手拉着手来看望我这个新同学，其中一位就是马明明。马明明不解的向我道：“你为什么从那么好的学校转到65中呢？”我如实回答：“因为回到自己的家里，吃饭可以吃得多一些。”明明又问：“你在北大附中学的是俄语，转到我们班后要学英语，可有困难？”我见她态度诚恳，长得样子又好看，就厚着脸皮说：“那就请你以后多加帮助。”当两位

女生离开我家，挥手同我告别时，我和母亲把她们送出胡同口，母亲抬起手来，指着明明的背影，似乎无意地对我说：“那个女孩子长得好美！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说话也温柔得体——你不觉得她是个好姑娘吗？”

自那时起，我对明明便产生了好感。是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缘分”、“命运”。

明明的家离我家其实相距不远，一个在东四12条，一个在东四13条。高中三年，我们经常一起乘坐公交车和无轨电车上、下学。她是回族，出生在一个无忧无虑、温暖和睦、有教养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兵工厂的中层干部，母亲是特级中学数学教师。明明是家里的长女，下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长有一双明亮、和善、动人的眼睛，言谈举止大方而娴静，比今天央视一台的播音员李修平还显得文雅。记得上高中语文课，班主任女老师在讲授汉代乐府民歌《焦仲卿妻》时，曾经在讲台上这样讲过：“古代焦仲卿妻兰芝长得真美呀！就像你们班在座的马明明同学。”

明明的学习成绩也相当好，文理科都名列同年级六个班女生的第一名。她在参加1963年的高考时，选择的作文题目是《五日记》，获得北京市高考作文第三名。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她5岁时患猩红热，发高烧，转成心脏病。因此，她虽然也参加了高考，但是在体检复查时，医生认为她的身体情况无法适应紧张的大学活，所以，她最后竟未被大学录取，有关方面安排她到一所教师进修学校教语文，明明从此走上了工作岗位。

高中时，有三件发生在我和明明之间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发生在高一时，一部分同学在放学后还上晚自习，我也没有回家吃饭，在教室里做作业。明明那时在学校入伙吃饭，发现天晚了我还饿着肚子，就从学校食堂买来几块红薯，放到我的课桌上，立即引起了几个坏男生和一两个嫉妒明明的女生哄堂大笑和议论。我抹不开面子，担心同学们认为我和明明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就把那几块红薯胡噜到教室的地面上。明明见我这样不领情，趴在课桌上啜泣，从此不爱搭理我。第二件事发生在高二时，全班同学参加“十·一”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群众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儿地分头回家。当我和明明等几个同学走到灯市口时，明明的心脏病忽然发作，手扶人行道

边的一棵大树，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天已很晚，同行的几个同学陆续离去，只有我陪伴着她。后来，明明的父亲和母亲前来寻找，接她回家。明明在父母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回过头来非常感激地对我点了点头。第三件事是在准备高考、最后冲刺那一个月，明明和我相约，一起到北海公园西面的北京图书馆复习要考的功课。每天我俩都是一早就乘公交车和无轨电车，来到北京图书馆那个绿树成荫的大院子里，分别找个最安静的角落，中午各吃各的从家里带来的盒饭，直到黄昏时分，看不清书本上的文字为止，这时，我和明明才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催促着回家。

是的，凡是真挚的爱情，总是以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为思想基础，一般也会经历一些曲折，甚至经历一些情感的痛苦折磨，最后才能达到心心相印、灵肉一致的美好境界。

自从我踏进燕园，开始紧张的大学生活以后，同明明的来往就很少了。但是当“文革”发生以后，在1966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回家后又到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看大学报，遇到也在看大字报的明明。她邀请我到她家，介绍北大和全国形势。此后几个月，每逢星期天我从北大回家，又往往去明明家里，和她一起看有关“文革”的动态资料和小报，同时，议论时政并交流思想。我认为，正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担忧，把两个高中同学的心联系起来，使我们有了思想感情基础。在这种越来越有吸引的交往中，我发现明明与高中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她的外貌具有一种青年女性的成熟之美，而且，她的头脑也聪明睿智。人们常说，患绝症的人也有过人的智慧；见到此时的明明，我对这句话才真的信服。例如，明明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事往往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力，能够一语破的，洞察到主要矛盾所在和问题的实质。她很早就通过综合分析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材料和自己看到的大字报内容，对那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抱怀疑态度；她多次表示担忧，担心“舵手”导航会出现重大失误。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也正是在与明明交心交往的那段时期，才促使我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社科书籍，顿开茅塞，石破天惊，形成了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系统的观点。

就这样，在那段时期，在我和明明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也渐渐萌生出了一种新的感情。两人单独相处时，自然也谈到了男女之爱，谈到了《西厢记》、《红楼梦》，以及《简爱》、《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但是起初，我们俩几乎一致认为，青年男女之间不一定非是爱情关系不可，像古希腊柏拉图所讲的那种“精神恋爱”也很不错。但是，此后在我和明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以上这些想法和说法，只不过是对于我们之间已经发生爱情的一种掩饰，是我们已经步入爱河的一个序幕，一首前奏曲。

1967年5月1日，明明提出，两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参加当晚在公园里举行的游园活动。我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关系就要前进一步，我有一些心里话可以单独在游园时对她好好讲了。但是，到了公园北门发现，她是带着妹妹小颖一起来的。这使我感到很不舒服，认为她的这个做法似乎说明她对我和她一起游园还有所顾虑，甚至有所防范。我的兴奋心情一下子转化成烦恼。“五·一”的游园活动虽然还是在“文革”时期，但是游园的人仍旧不少。五光十色、耀眼的礼花穿破夜空，从沉静屹立的白塔后方升腾起来，照亮了波浪起伏的北海海面，也照亮小颖妹妹欢乐的脸，但是，我和明明都笑不起来，心里都交织着很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行三人缓步走在公园北岸，都很少说话语言。我们还没有走到五龙亭，就觉得这次游园索然无趣，从那里折回。可是，在回家乘坐的13路公交车上，在非常拥挤的人群中间，而且，就在妹妹小颖的身旁，明明似乎是为了对我表示一种歉意，为了给我一个弥补，也是为了表达她心中积蓄已久的爱意，突然，一下子挽起我的左臂，而且，把我的左手按压在她那高耸、柔软又发热的胸脯上，使我惊喜万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倾慕已久的姑娘的肉体，当时屏住气，像被闪电击中，一动也不敢动，眼望车窗外，不敢和她四目相对。正是她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表达爱情的方式，使孕藏在我内心已久的爱情种子，一下子彻底苏醒、萌发了。

就在“五·一”次日，我拿到两张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的歌舞演出票，下午，马上去明明家找明明。但是，她仿佛已经料到这天我要去找她，仿佛她对前一天晚上自己的举动感到后悔、害怕，仿佛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旦突破的前景感到担心，她去了姥姥家，很

明显，她是有意回避我。我不甘心，于是，让明明的小弟把我带到明明的姥姥家，把明明唤出来。明明心慌意乱地靠依在姥姥家的半扇大门上，表示不大想去。但是，她拧不过我，于是，晚上终于陪我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厅里，两个人亲密地坐在一起。音乐厅的舞台上，上海歌舞团在演出当时流行一时的革命舞剧《小刀会》和《红灯照》，几十个男男女女演员，手举着金光闪闪的红灯笼和银光闪闪的义和团、太平天国的大刀和长枪，舞来舞去。台下，在嘈杂的歌舞声中，我握住明明的一只白皙、细长、微微抖动的手，非常诚恳地向她倾诉了多年来对她的爱慕之情，同时，表达一生只爱她一个人，将来一定要与她结合、灵肉一致的决心。

那场节目还没有看完，我和明明就走出了剧场。一个在剧场外面等演出票的小青年伸手要我的入场券，我在掏票给他时，把衣兜里买好的一包糖果也掏出来，五颜六色的糖果撒了一地。明明“咯咯”地笑着，一手提起花裙子的下摆，弯下腰，一手在地上摸索，一一捡起那些糖果，带着羞涩和兴奋之情，把糖块交给我。我们选择了公园的一个安静、有灯光的角落，双双坐在一条长椅上。明明扬起容光焕发的脸，略带歉意、恳切地对我说：

“这可是人生大事，马虎不得。你要考虑好——我的病，很可能不允许我们有后代。”我回答她说：“我的决心已下，决不动摇。既然我们都知道人生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于怎样度过、有无应该追求的正确价值，那么，爱情的意义也不在于有无后代。如果我们将来实在想要个孩子，可以从兄弟姐妹那里过继一个。”我和明明肩膀相依走出中山公园，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真大，真开阔啊！长安街上一盏盏高大的街灯灯光映照着我们幸福洋溢、年轻的脸。五月的晚风清爽而舒适，空气是那样新鲜而醉人。明明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天真高兴，像是在做梦，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孤独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我说：“我也是，好像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生。”

我回到燕园没过两天，便收到一封用小小的、秀丽的字体写来的信。这信是明明写来的，信中只有不多的30个字：

“亲爱的琼：我好幸福。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它属于了你。”

可是，过了几天，我又收到明明寄来的一封信。信纸显然带有泪痕，信是这样写的：

“琼，我亲爱的朋友。我不得不又给你写这封信，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请原谅，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把我们的决定向父母讲了，他们表示反对，坚决不同意，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很难过。但经反复考虑，我想，还是应当尊重父母的意见，他们有人生经验，也是为我们好。从今以后，就让我们做最好最好的朋友吧。我至死都会珍重你对我的这份难得的情意。请允许我做你的好妹妹，我今后永远把你看作我的好兄长。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像过去那样经常来往。”

接到这封信的当天傍晚，我就乘坐公交车赶到明明家。明明的父母为我做好一桌丰盛的回民饭菜，但是，我和明明都吃不下去。饭后，伯父跟我做了一次严肃而诚恳的谈话，他的主要意思是：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是明明和我结合的障碍，惟一的障碍是明明患有心脏病，不能结婚；如果结婚，遇到不测之事她就会早亡，所以，希望你们之后只做朋友，这样对她好，对你也好……但是，听了伯父的话，我表示反对，双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发生争吵。这次谈话，伯母没有加入，但明明一直在场，谈话持续得很晚。最后，还是明明把谈话打断，批评我的态度不够冷静。我垂头丧气地回到燕园。

此后则是一段很难过、令人难熬的日子。尽管我也曾去过明明的家，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情形已全然不同。有两三次，当我刚刚走进她家那花草簇拥、收拾得干净利落、宁静的小院时，听到明明正在屋里忧伤地轻声歌唱格鲁吉亚民歌《苏丽柯》和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再以后，明明便第一次入住阜外医院。她出院后，想不到伯父和伯母主动把我请到她家，做了一次长谈。他们竟然同意我和明明相爱，而且，同意我们订婚！这真使我和明明感到意外！

原来，明明当初虽然给我写过中断恋爱、只做一般朋友的信，但是在父母的面前，她始终未退让一步！她明确告诉父母：“生命属于我自己，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爱他，是真爱，不是可有可无的那种爱。即使将来发生不测、不幸之事，付出生命的代价，粉身碎骨，我也绝不后悔！”只因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加重明明的病情，危及她的生命，

明明的父母才不得不作出妥协。当明明出院后，边落泪、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深受感动，也不禁落了泪。我第一次感激、深情地抱吻了她，领略到她那鲜红、美丽的嘴唇是甜的，醉人的……

再以后，就是我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了。经过反复商量，我和明明选择了我去宁夏隆德。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我去那里能够得到锻炼，也因为那里是回族自治区，适合明明的生活习惯。再者，明明有几个亲戚在宁夏，我和明明以后在宁夏生活，可以得到亲戚们的照顾、帮助。

不过，就在我已经报名去宁夏工作之后，有一天，我在和明明见面时，谈及军工宣队开进燕园展开“清队”运动后发生的不正常情况，也谈及我的一些顾虑。我对她说，现在北大揪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揪出了许多“反动学生”。我还对她说，如果我也被揪出来，恐怕经受不了那样可怕的批判斗争和人身侮辱；也许，就活不下去了。记得明明是这么劝慰我的：“不要多想。那种可怕的事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即使真的落到你的头上，你也要活下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我。我现在能够没有你吗？你如果不在人世，我也就无法存活了……”

然而，我哪里会料到，种种不幸的事情果然真的发生了呢？

1969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北大军工宣队第一次批准我回家探望亲友的那个晚上，我忐忑不安地走进阜外医院的一间重症病房。病房中只有明明一个病人。她躺在病床上，头部被枕头垫得很高，发着高烧，还处于昏迷状态，漆黑而卷曲的长发遮掩了她一部分雪白的额头，裸露出来的那部分额头和脖颈上，不断冒着亮晶晶的汗珠。从她的一个嘴角处，不时流淌下一股股红色的血水。她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在忙碌，有的用浸湿的纱布，揩她嘴角留下的血水；有的在观察“嗡嗡”作响的几种医疗仪器；有的蹲在床边，用一个扁平的便盆为她导尿。伯母俯身握着明明的一只手，对昏迷中的她说：“明明，明明，你看谁来啦？你睁开眼看看谁来啦？你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呀！”可是，她没有醒，仍旧处于昏迷状态。忽然，我看到明明在病床上开始扭动身体，而且，喃喃地说起不连贯

的胡话。她说的是：“**不白之冤啊！不白之冤……牛虻……保尔……一个丽达，又一个丽达……是个好姑娘……红毛衣，长辫子，雪白的皮肤……修长的身子……一只天鹅，像一只天鹅那样美……**”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扭动身体，发狠似地说：“**该死的！你这该死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死还是活着……**”

听到明明在昏迷中说的这些胡话，我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心中不禁涌出一阵阵酸楚，眼中涌出一股股热泪。我把握住她的一只手，焦急地说：“明明，明明，我来了，我还活着。你睁开眼看看我，快醒醒，快醒醒！”但是，她一直没有醒，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夜已至深，我徒步回到母亲家，次日一早返回了燕园。

1969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走进阜外医院的病房区，在进入那间重症病房之前，伯父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已经醒过来了。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稳定。你见见她可以，但是不可久留，免得引起她情绪过于激动，病情发生反复。我先回病房去，说说你的情况，让她有个精神准备。过半个钟头，你再进去和她见面……但你也只能呆半个钟头。”

半个小时后，我走进那间病房，只见伯父、伯母分别站立在病床左右，两个人一个人拉着明明的一只手。明明仍然躺在床上，新剪的头发整整齐齐。她的双眼格外明亮，显然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望穿秋水般地等待我的到来。当她看到我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是个活生生的人时，万分激动地左看身边的父亲一眼，右看身边的母亲一眼，双眼闪耀着泪花，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好像在说：“这难道是真的？他还活着？”我奔向前去，和她轻轻地拥抱了一会儿，仿佛隔世后又重新团聚。我和明明仔仔细细地彼此打量对方，都落了泪，激动不已……过了一会儿，伯母对明明说：“该吃药了。这次就这样吧。以后他还会来看你的……”伯母在送我走出病房时，在楼道对我说：“唉！真是个痴心的孩子！”伯母还告诉我：在这次给明明修剪头发时，明明说她两耳旁的鬓发不能剪，因为琼一直喜欢……

1969年7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走入阜外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房间里虽然有两张病床，但是只有明明一个病人，明明的妹妹小颖在陪护。不知道什么缘故，这次

明明接待我的态度显得矜持而有些冷淡，她坐在病床上和我谈了一会儿话，询问过北大的情况之后，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严肃口吻，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看来，你的事情可能不像我们原来估计的那样坏，你也许能够顺利毕业。可是，我的病情却很难说，很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你一定要有精神准备。现在，我只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我万一不幸去世，你不仅要孝顺伯母，也要孝顺我的父母。我的妹妹弟弟还小，今后你要尽可能给予帮助。——还有，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我们的爱……”我听到这样的话，热泪夺眶而出，但又尽力抑制住了悲伤，也许是过于乐观，一再劝慰她不要多想，同时，也答应了她的要求。上午10点，明明的母亲来到病房，替换下小颖妹妹。我临走时，深情地亲吻了明明的额头，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左脚。伯母送我时，说明明的病仍然不好，危险。我还宽慰她一番。

不料，这就是最后一次探望，竟然是和我心爱的未婚妻子的诀别！

1969年7月24日，天气闷热，外面默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燕园里一派昏暗。我攀上38楼寝室一个双层床的上铺，正准备开始午睡时，突然听到有人猛敲寝室的门，叫唤我的名字，要我去38楼二层军工宣队办公室接紧急电话。我知大事不好，忙跳下床，冲出房门，在38楼一层与二层楼梯拐角的窗台上，看到一只小麻雀被雨水淋湿，身体缩成一团，正在悚悚发抖。我拿起电话，听到明明的父亲在电话那一端，用一种异样的声音喊道：

“快来阜外医院！明明不行了……”

我顾不得穿衣打伞，只穿一个挎篮背心，冒雨赶到医院，在太平间，看到明明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们正围在已经死去的明明周围，伤心地哭泣。明明的遗容虽然安详而坚强，但是，还在睁着双眼，她死不瞑目，仿佛在幽怨地质问上苍。“为什么？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次日上午，天气非常非常热，盛夏的毒日炙烤着大地和城市。一个头戴回民小白帽的中年汉子，双脚蹬着一辆载有明明遗体的黑色灵柩的三轮车，行驶在前；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骑着一辆自行车，汗流浹背，跟随其后，陪伴着死去的明明从阜外医院出发，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四、府右街，路经我和明明高考前复习过功课的北京图书馆，再经过中学

时代我俩经常搭伴儿行走过的东四，到朝阳门；从朝阳门外再往东南，最后，到达日坛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在清真寺一个偏僻的小屋里，按照回民的宗教习俗，几个中年妇女把明明的遗体清洗干净，又在遗体外裹上一层又一层雪白的尸布。大胡子阿訇念了《古兰经》。亲友们鱼贯进入小屋，围起死去的明明放声恸哭。一位中年妇女并不知道我和明明的关系，在众人的哭声中叹惋道：“可惜，真可惜啊！一个多么年轻、美丽、纯洁的姑娘。主啊！还是个处女呢……”

众人又簇拥着柩车，头顶烈日，踏着长长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往东走，再往东走，拐了个弯儿，还往东走，最后，来到一片四周长有黄澄澄麦子的空地上，把明明的遗体土葬，推上一个长方形的坟头，但是，并没有竖墓碑。我留意到，在埋葬明明的坟地附近有一条小河和一个小水壩；远处，还有一个简陋的游泳池，隔着一些树丛，从这里可以听到孩子们在游泳池那边传来的一阵阵欢乐的叫声和无忧无虑的大笑声……

自此以后，我从外地只要有机会回到北京，就一定要到这里来一次，在明明的坟前凝神伫立一会儿，心中充满难言的哀伤和针扎般的痛苦。■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六）

——回家的路

陆伟国

二次串联

9月5日中央刚发出大串联的通知，才两天时间，北京就受不了了，因为那时已经有不少外地学生滞留在京。人大校园里的所有教室都挤满了人。9月7日，鉴于外地来

京学生暴满，周恩来特地来人民大学，在大操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动员滞留学生尽快离京。他在报告中讲到了当时接待外地来京学生的窘迫状况。他说：“现在天气渐渐地冷了，同学们也没地方住……找不到地方就在车站的水泥地上睡，甚至在学校广场睡”。他提出的建议是，由他来念一下林彪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再放一放‘八一八’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五彩电影”，算是间接满足外地来京学生想要见到毛主席的愿望，而后话锋一转，他就要求9月1日以前来的学生要马上走，9月1日以后来的也要走。但这显然已经无济于事了。（原话请见工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张文敏、王俊奇、徐家琳当时的整理稿）

秋天的几个月里，校园里挤满了外地的学生。连我们的寝室里也住进了一个邻班同学的同学介绍来的一个人。那人也是个上海人，不过品质很可疑。那天，他又领了个外地中学生来，吹嘘他如何地革命、如何地有本事，似乎就是首都红卫兵的一个头。我忍不住在边上说，这个人是临时住在我们这儿的。

但是那中学生很天真很无知，好像两边的话都没听懂。没两天，我们就把那人撵走了。

乱哄哄的环境，使我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待着也没劲了。保守与造反的两派，政治上对立的差别已不大，都在争相披上“革命造反”的外衣。连保郭的“八一八”也在10月12日假装批判起郭影秋，引得“三红”前来搅乱，觉得两边都没什么意思。大家纷纷往外走，这回就不是集体行动，而是各人自行活动。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又提出步行串联去大寨、再去延安。

我没去，不想出这个力。说实在，我对陈永贵不敢恭维。不是说我当时就有多高的水平，能看出什么问题。而是对那时还能在政治舞台上蹦跶的人，不是说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表示疑问。陈永贵还曾在1967年4月16日来过人大，表态支持我所在的“三红”这一派，并为“三红”题字。就写了“人大三红”四个字，那个“红”字笔划超过了三划还写错了，左边绞丝旁下面写了四个点。直到“文革”之后，他已经身为副总理，

文化水平却依然没有长进，连在文件上批示同意也写成了“同义”。当然，这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陈永贵在“文革”中照样起劲得很。虽为农民出身，却无农民素质。就以凌志军先生的一段话作为佐证：“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就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的思想动向公布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之用。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请见：《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至于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虚报产量、飞扬跋扈，这些更不用说了。（陈永贵的事远不止上面这些。据最早在六十年代初采访过陈



永贵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燕凌先生给笔者的口述材料中说：“甚后来在‘文革’中有人举报且经调查证实陈永贵在敌伪时期做过日本的情报组织兴亚会昔阳分会头目，报告给毛，毛却硬压下去，说这个事不许再提。于是，陈永贵这个不光彩的历史污点也就不算

（我系的步行串联队在黄河岸边的合影，其中好几位是我班同学。）什么问题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毫无政治原则。毛之所以让大寨当了特大号典型，实际上看重的并不是农业学大寨，而是要全国农民像陈永贵一样服从他，也就是按照他的意图来加强对全国农民的统治，巩固他的权力。”

鸭绿江边

那我去干吗了呢？我回家了。回家的理由，不那么“革命”，就是想省点伙食费。

也不上课，待那儿天天白交钱干吗呀？三年多了，也没钱回家，只有大串联，才能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回家去吧。此时的串联，已成了消极逃避极左狂潮的无奈之举。

到了十月底，同班的孙珊同学，她爱人在山东黄县，说那就顺路一起走吧。可我们到了北京站一看，乖乖，人山人海，即使是想要离京也不容易，只有往东北的才有票。于是我们踏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先出了北京再说。到了天津，想下去都挤不下去，只好再往前。到了沈阳，下了车没出站，又调头上了往南进关的车。那车上挤得不得了，好不容易才上去，挤在车门口，只有个插脚的地方。车厢里空气浑浊不堪，不一会就觉得喘不上气。一打听，这车已经停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什么时候开。我们看对面有趟车还空一点，赶紧就过去了。上去之后，才知道是开往丹东的。于是，我们就到了边境城市——丹东。

丹东，很清静。据说后来那首有名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是以丹东为背景的。而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有这样宁静的地方还真不易。我们去了鸭绿江边，看了看当年志愿军跨过的大桥，看了看对面朝鲜的绿水青山。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国。江面不是很宽，对岸静的房舍、动的车辆，看得挺清晰。我们还爬了市区外面一座有个亭子的小山，在亭子里环顾四周，视野更加开阔，江对面起伏着绵延不绝的青山，一直到茫茫的天边。

看着朝鲜的土地，难免要想到朝鲜问题。用志愿军战士的鲜血，保住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让鸭绿江的对岸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这是一直以来的说法。在那时当然没法去全面分析朝鲜战争的得与失。如今看来真是一言难尽。这个话题讲起来，头绪就多了。即使是在今天，在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多年的今天，也很难在这儿做个全面、透彻的评价。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到底得到了哪些，又失去了哪些？简单讲，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保住了金日成政权。但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狂热无知，对自己的人民和别人都不负责任，一再的决策失误，才闹出了这场战争。当时，金日成简单地以为美国在1949年

抛弃了蒋介石，也一定会在1950年抛弃李承晚，这正是挥军南下，吞并整个南朝鲜的绝佳时机。谁知当北朝鲜真的突然袭击，大举南下时，美国当局才如梦初醒，连忙反击，来个拦腰切断，打得北朝鲜措手不及、满盘皆输。就在美国军队横扫朝鲜半岛，眼看就要推进到鸭绿江边时，又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中国出兵了。中国出动了78万军队（另一说是135万，这可能是一次性与累计数的不同，即统计上讲的时期数与时点数的不同）。美国当局也没料到这一手，连忙后撤，一口气退到三八线附近据守，北朝鲜得以继续存在。

然而，就是这个用几十万中国军人的生命和鲜血保下来的北朝鲜政权却自始至终与北京方面心存芥蒂，公开的和暗地的矛盾不断。据2014年2月2日凤凰资讯转引韩国媒体sbs报道，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因对中国在东北地区军事演习不满而放狠话说，“鸭绿江、图们江不但是国界，也是战线。”看如今的中朝关系还真不如与原先的死敌韩国之间的关系。中韩关系还倒比较自然和正常。（补充说明，2016年美国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韩关系又起波澜）

而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首先是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损失。据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说，我军先后出动志愿军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即伤亡、失踪、被俘近百万人。这场战争拖累了国内亟需的经济建设的后腿，也使我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错过了建国后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时也使几乎已经水到渠成的台湾问题延续至今也难以解决。

三年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1957年7月5日，毛对来访的米高扬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二句引文及上面提及的志愿军损失人数，请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何方的文章《朝鲜战争的得与失》）。几十年过去了，朝鲜问题对于中方依然是个吞不下又吐不出的苦果。朝鲜的核基地和火箭发射场距中朝

边境不足 100 公里，2016 年核试验引起的地震，连延边地区的小学都受到了影响，孩子们从教室里跑出来躲在操场上。最后真还不知道会出个什么事。

转过脸来，那个时候，丹东市区却显得格外的宁静。在我们住宿的街道文化室，还有一群朝鲜族的大妈大嫂，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排练舞蹈。气氛是那样的恬静，舞姿是那样的优美。真是很羡慕，羡慕在风雨中还有这样和谐的群体。在狂乱中的这份安宁，更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这儿也不是世外桃源。临走那天，晚上在候车室里，那位同学上洗手间了，我正在长椅上躺着闭目养神。突然，一个警察过来喊醒我，很粗暴地说，要跟他走。我问是怎么回事啊？那警察说，你别问，就是跟我走。我说，不行啊，我还得等另外一位女同学呢，我跟你走了，她上哪儿去找我啊。他却吼起来了，别啰嗦，走！一副就要动手的样子，好像就要逮住一个越境特务了，这立功的机会岂能错过。旁边的人都紧张地瞪着眼看，看他怎么收拾我，又一个阶级敌人将被“打翻在地”。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有另一个警察跑过来说：不是他，不是他。两个警察没表示任何歉意，便调头匆匆地跑开了。

是什么眼神啊，还边防警察呢。真叫人害怕呀，差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要掉进一个冤狱里。我那位同学回来要是见人没了，还真没地方找。所以，在这之后，我看到军人和警察，也会留个心眼，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

当时我在想，莫非这个地方也有偷越国境的？就算要跑，也不至于瞎了眼往那个坑里跳啊。原来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也是暗流涌动啊。那时跟朝鲜的关系已经不舒服了。那个时候，跟周边国家称得上舒服的，恐怕没有。等我那同学回来时，一切归于平静。她都不知道刚才发生的这件事。最近，我才知道那时还真有往北朝鲜跑的。网上有篇《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作者：高华，凤凰资讯 2014. 2. 16，原载于：近代中国研究网）的文章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1979 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大概就是我到丹东的那个时候吧，

结果边防战士就特别紧张了，连眼也看花了，看上我了（也真有越境过去，被北朝鲜遣返回来而判处死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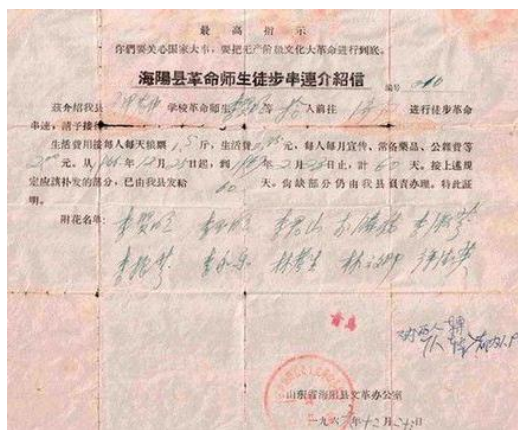
山东半岛

离开丹东，又踏上了回北京的列车。这次上车，可是在大串联中难得有的宽松，想坐哪就坐哪儿。过沈阳站时，看着别人连滚带爬、你争我夺地上来拼命抢座位，还庆幸我们选择的走法是对的。不过我们在天津就下了车。这是为了要上山东黄县，采取了一个迂回战术。

火车进天津市区，从车窗望下去，竟是绵延十余里的贫民窟。低矮拥挤的平房，挤得相互间只有极小的缝隙。那些房子又极为简陋，顶上只铺着些油毡纸，钉着些木条，压着些砖块。车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一大片、一大片油毡纸的屋顶，上面是星星点点的砖块，几乎延伸到一直到天边。

出站是中午时分。大概是正门太挤，我们是从一个狭窄的边门出来的，也是很挤。在公交车上，看了几眼天津的街景，最为典型的是各式的近代洋房、海河上的铁桥，跟在火车上看到的贫民窟不一样。

不过那天，我们没在天津停留，出火车站便去了海河边的码头。别看这几个小时的路过，27年之后，我女儿在这儿上了南开大学。她在校的四年里，我来天津不止十次。



傍晚时分，我们就登上了开往烟台的轮船。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海轮，只是那码头不大，轮船也不大，远不是想象中的能劈波斩浪远渡重洋的那种气派。

轮船在半夜到达黄县的龙口港，没有靠码头。那位孙同学下船了。下船的人是从船边的舷

梯下到小筏子再转驳上岸。而我留在船上，继续往前，天亮时到了烟台。在一片晨霭中，轮船静静地进了烟台港。几声汽笛惊起几只海鸥，从海面掠过。烟台早年有段时间曾是英国的租借地，所以它的街景有它的特色。市区里靠海边的街道并不宽，排列着一些像是二、三百年前工业革命初期那种不大的二、三层的西式浅灰色的楼房，很有一种当年欧洲小城的风貌。我们国家地域之大，还真有不少包容了世界各地建筑风格的橱窗。而北大街还是狭窄的石板路，一种老式的陈旧的中式街市。还没来得及被“破四旧”去掉的“亨得利”之类的招牌依旧夹在其中，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那一夜，住在西大街的一幢红砖楼房的旅社。那年头，串联的学生能住进旅社，还是很少的。后来，我在烟台工作时，常在它门口经过，总要往里望一望，虽然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第二天白天，上了靠南面一座小山上的古建筑——毓璜顶（玉皇顶），在那儿可以俯瞰当时的整个烟台市区和海港，还可以北眺大海和长岛列岛。13年后，我的妻子在毓璜顶半坡的烟台地区医院妇产科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冬天，下的雪特别多，那坡路结上冰，滑得不得了，太难走了。

烟台，在我生命中，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四年后，我在这儿经历了第三次工作分配。十一年后，我又成了这个城市的一员，住了四年。我在烟台地区，前后生活了十一、二年。在我生命的岁月中，烟台不是一页二页，而是整整一卷，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断。

从烟台，又去了青岛。火车在兰烟线上行驶。胶东丘陵平缓起伏，海莱山区风景宜人，那一片片的农田，那一片片的果园，在车窗外向后退去。未曾想，这些急驰而过的图片，四年后，就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我几乎踏遍了这儿的山山水水，无数次地穿越过这铁路两旁。

青岛，是座名副其实的美丽的海滨城市，不能不由衷地感叹它使人流连忘返的景色。我在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中多次提到了它。近百年前，德国人在这儿开辟租界，留下了这片德国风格的建筑。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满是绿树。山上山下，绿树丛中，

点缀着层层红瓦，错落有致，那是成片的欧式别墅。天主教堂高高的双塔尖顶，在阳光下闪耀。离海边不远的小巧的火车站，也满是异域风情和另一种的历史沧桑。甚至连百年前建的城市下水道，也使2012年夏天一场大雨内涝就淹死人的那些城市汗颜。据说几年前当年修建下水道的德国公司还来信说，哪些部位该维修了，有些备用件放在了什么地方。按照来信的说法，还真找到了这些备用件。不能不说，这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德国民族学习的地方。当然，建设这些建筑和设施的劳工是当地的老百姓，不能都算在德国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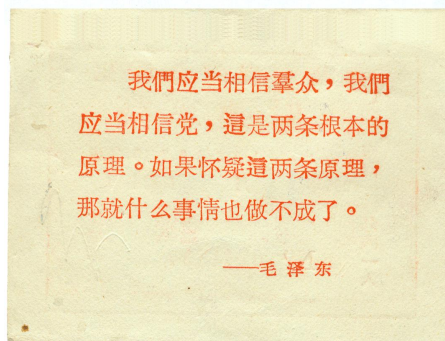
青岛的景点，除了人们常去的栈桥、鲁迅公园、八大关，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水族博物馆，那是在当时所知所见的唯一的水族馆。我喜欢小动物，喜欢看它们自由自在地活动。尤其喜欢看小小的热带鱼在相对较大的水族箱里、在宛如森林般的茂密水草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甚至有点羡慕它们。或许它们有它们的烦恼，但至少看起来是那么的悠然自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靠前海沿的商业街，两边也是西式建筑，只是规模小了点。在街头表面上还看不出有多大的“革命”气氛，但实际上已是风云骤起。青岛的“文革”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当时五中的革命师生把他们称之为“中国保皇派的祖师爷”康有为的尸骸挖了出来，并把他的头颅骨用车推着游街示众。二是他们有个副市长叫王效禹，通过康生的儿子张子石与最高层挂上了勾，成了领导干部革命造反的典型，当上了省革委会主任，在全国都名噪一时。

在青岛，我住在一个中学的大房间里。当时里面还住着一帮十多个上海中学生。我在街上买了个极廉价的一、二元钱的贝壳工艺品，放在床底下。第二天没了，当然不会有别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叽哩哇啦地商量着。我当然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没有戳穿他们，只是鄙视地看着。

我之所以在几十年之后，还要提起这件小事，是顺便想起很多。尽管我是个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我从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就认为上海或上海人就一定是怎么

怎么地好。讲“海派清口”的上海著名艺人周立波说：“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么能搞到一起呢？”对此话，我倒不以为然(但我对周先生很多针砭时弊的演出内容表示赞赏)。我就是个既能喝咖啡、又能吃大蒜的人，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打比方，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论北方还是南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有好的人，也都有坏的人。就地域而言，也是这样。炽热炎炎、冬夏长青的海南就一定优于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东北大地？反过来，也不能说白雪皑皑、千里冰封的东北大地就一定优于炽热炎炎、冬夏长青的海南。我为我的故乡上海感到骄傲。但要是我出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不管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我也会为那个故乡而骄傲，仅此而已。人对于生我养我的故土会有种特殊的感情，这很好理解，但也不必为延伸到别的意念而去无限制地夸大这一点。



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是优秀民族。他们能够进化到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个位置，能说不优秀吗？如果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那就与法西斯的纳粹思想相差不远了。我们人类是个大家庭，而地球，则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家园。少一些偏激，多一些理性，这也是“文革”灾难留给我们今天的教训之一。豁达大度、不卑不亢，才是我们“大国之民”（这是借用有些人的说法，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自诩）应有的态度。

(当时我用的青岛市红卫兵免费乘车证)我也顺便在想，尽管我们有绵延一万里长的海岸线，但中华民族还是挺内向，挺拘谨的，基本上还是个内陆民族。清朝以前，我们的主要城市都不靠海。有几个沿海城市，也不是直接建在海边，而是在内河口里面的河边，规模都不大。除了尚未完全解开谜团的郑和下西洋和停留在神话传说里的徐福东渡，我们民族

离大海似乎一直都远远的，甚至还几度禁海，把老百姓都往里撤几十里地，不许下海。连隋炀帝时期修的那个大运河，何苦呢。就靠在海边，不走。非要费那个事，从地上开挖出上千里地的运河。我想，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短处，而正是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专制狭隘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弊端所至。

前后两次串联，我去了七个城市。除了南京，其余六个都是沿海城市。而我人生的最后落脚，却恰好是在南京。■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

——抓“五一六”

宋翔雁

一、至今未解的疑惑

在我的印象里，不论是全国范围内的抓“五一六”或地院内部的抓“五一六”，都没有像文革发动前那样先大造舆论然后再运动群众，从而哄然一下文革的浪潮就席卷了全国。相反，抓“五一六”这一涉及到全国范围的整人运动，却没有大块头的文章首先见诸报刊（即先造舆论），而是党内文件或通知一类，秘密地传达至各省市、地区和部门单位的军管、军代表或军宣队负责人和领导成员中（当时各中央部门、省市自治区、各高等院校等均被军管或由军宣队领导），继而就在各部门、单位成立抓“五一六”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专案组，筛选、排队，列出本部门、单位的待查人员，而后逐一地开始对涉嫌者或点名批判、批斗，或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或关押，具体采取何种措施则取决于对涉嫌者问题严重程度估计、涉嫌者交代认罪的情况（态度）。在此应当说明一点，上述文字所论述的，只是我个人在被关押整肃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思考而得出的个人看法，带有推测性质，

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有待于那些参与甚至领导组织抓“五一六”的人们的觉醒和揭发，否则真相恐难大白于天下！

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我认为文革中有两个最大而又令人生疑的事件，即林彪事件和抓“五一六”事件。前者不在我的回忆范围内，故不费笔墨。后者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人们探寻、思考：

1、在整个抓“五一六”的过程中，各单位运动领导小组是否向广大群众完整地传达过中央下达的抓“五一六”的红头文件？反正我不论在被隔离前或被隔离后，都没有听到过文件的全文。我所听到的只是几句零星定性的话语，即“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是反总理的（指周恩来总理）等。

由于这个原因，当军宣队换班时，北京和湖北两地的军宣队共四人一起找到干校“学九楼”（干校学员的戏称，类比北京地院党政领导的办公楼）谈话，时间大约是七一年十月中上旬。当时我就向他们提出了我的质疑：既然说“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阴谋集团，那为什么地院里有那么多“五一六”分子，这岂不比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公开嘛？听后，蒋喜亭（干校北京军宣队负责人）大怒地对我吼道：滚！致使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我又再次被押解到长田村牛棚，继续被关押，而且进一步加大了对我的人身迫害。

尽管如此，我的疑惑并未消除。但我政治上的幼稚，加上没有报纸、听不到广播，我还天真地认为问题可能只是出在下边呢。解除隔离后，当我了解到全国各地都抓了很多“五一六”分子，看来就不单是地质学院一个单位了。这样我的疑惑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凝重了。试想，如此众多的成员参加的组织，何以能隐藏很深，又何以能搞阴谋活动？岂不定性和实际相距甚远吗？！

2、抓“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数年之久，为何在中央和省地一级的报刊中极少甚至没有正面予以报道其成绩、意义、经验，以及进一步深入的方向？这也是历次大的运动中十分少见的。

3、““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最终在胡耀邦领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时，予以彻

底否定了。据说，胡耀邦曾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案说过，莫须有。是否属实，我无考据，不好妄言。但这一事件确实被莫须有了，也可以说是一风吹了，而且吹得干干净净，否定之彻底远胜于对反右运动的否定。但遗憾的是，对规模如此之大，历时也的确够长，被整人数和被牵连人数不见得比反右少多少，但为何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错误的性质和责任没有任何说法呢？而且迄今为止，对抓“五一六”一案的调查、研究、分析的文献和林彪事件相比也少之又少。难道有难言之隐，或为君者讳、或为尊者讳乎？难道这样做也叫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吗？

4、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从多次让我参加的已经交代承认是“五一六”的人登台亮相的大会，让他们讲述自己加入“五一六”的情况之中，我得知参加“五一六”需要填写表格，要有介绍人，甚至有人还说宣过誓。听后当时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中央给“五一六”定性的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嘛，加入需要有一定的组织程序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相信了“五一六”成员加入时要有介绍人，要填写表格这两点，让我在隔离审查期间，越发坚信自己从未加入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绝不是“五一六”分子。我的问题肯定是组织上搞错了，相信了他人的诬告。因为文革期间，从来没有任何人介绍过我加入任何组织，也从来没有任何人让我填写过加入组织的任何表格类文档，我在这方面的记忆是不会有差池的。

但在坚持一年多后，在校专案办赵壁媛利用我妻子每天一封家书的“攻心”手段下，我曾一度动摇，觉得就违心承认算了。但是介绍人和表格两条让我无法编造，而重又“坚定起来”。赵壁媛毕竟是整人高手，从交谈中察觉了我心态上的变化，而更加大了攻心的力度，妄图一举攻破我的内心屏障。当我试探着说我对介绍人和表格一点印象都没有时，她很爽快地说道：你现在的问题不要拘泥于介绍人和表格这类细微末节的问题上，而要放在加入“五一六”组织的问题上。何况““五一六””组织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有时让人去参加一个会，就算参加了，他们是不会拘泥于任何形式的！

有了这一暗示，就使我从动摇迈上了违心承认自己是一名“五一六”分子的不齿之途。

当我被解除隔离后，在与人交谈中，得知确实人们加入“五一六”的程序是多种多样无奇不有的，而且都得到了专案组的认可，前提是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就行！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被定性为隐藏很深的阴谋集团就是通过这种杂乱无章的荒唐方式和手段建立起来的吗？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能隐藏得住吗？为什么这类破绽百出、相互矛盾的交待材料，就能成为抓“五一六”专案项目的定性材料呢？如此的审查方式岂不太不严肃了吗？！

5、就地院和干校抓“五一六”运动而言（就全国范围而言，因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妄言），被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体。想当初是这些人奋不顾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有理，为实现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按《文革十六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要求，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支中央文革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红卫兵战斗组织，为揭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建立各地的革委会等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今天看当然是不对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这些毕竟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做出的决定，而且是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形式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布的，几乎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信之、从之，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首先执政党就必须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从自身做起，而不应当首先拿响应号召而起来造反的群众来问罪）。

当然毋庸讳言，后期，各地造反派组织陷入派性斗争，一度对文革的进程造成干扰，“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派出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各高校和各中央部门，直接领导运动，恢复中央领导的权威。中央的这一举措应当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各地秩序逐渐正常，高校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也于70年中陆续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看来斗批改的文革重任，已经水到渠成地可以进入改的阶段了。但为何中央会杀了个回马枪，开始清洗起造反派来了呢？！难道这确实是毛泽东自己的意图，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版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再现？还是中央内部再次出现派系斗争后的一种以牺牲造反派群体来换取新一轮妥协的产物？！

而且令人感到称奇的是，当群众发动起来开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时不时

会有个别中央首长站出来替被揪斗的人说几句保护性的话，诸如，某某过去还做过一些好事呀，要一分为二呀，再给他一次机会呀等等。借以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让被揪斗干部的处境稍许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在抓“五一六”时，竟没有任何一位中央首长，为被以“五一六”分子名义批斗关押的原造反派群体中的任何人说过类似性的保护性话语，难道对这些人就不需要一分为二，就不必再给一次机会了吗？！

自我被宣布解除隔离后至今，时光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四个年头了，但这些令人生疑的问题却从未在我脑海里消失过，相反，它却成为使我远离了过去成套说教的重要原因。让我曾坚信不疑的所谓“我们的批判是对事不对人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政策条文所展现出来的美好说教，在这些疑惑和残酷审查的现实面前，全部被砸得粉碎，岂能让人再信呢？！

二、山雨欲来，与亲人的短暂相聚

地质学院的抓“五一六”运动是分三个地方同时展开的，即北京地院、湖北丹江及江西仁和“五七干校”。此外，凡涉及到已经分配到外单位的学生，则统统将相关材料转到该学生的所在单位，由这些单位负责审查，与地院军宣队无关。但军宣队所转出的材料，对这些学生被整肃却是致命的，因为抓“五一六”是全国性的运动，故对由地院分配出去的学生，各地各单位都尤为关注。因地院《东方红》在文革初期执行伟大领袖关于“造反有理”的指示最为坚决，取得的成果也最大，曾成为中央文革手中向全国各地造反派推荐的一面旗帜。所以对来自该校毕业生中的嫌疑人猛批猛整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样做也为那些整人者今后的更快爬升提供了阶梯。

我在干校得知地院开始在抓“五一六”分子一事，大约是在70年6月份，当时干校中很多人都在传北京地院召开了抓“五一六”的大会，据说贾振远已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对此当时自己也没太在意，但时隔不久，我得知睡我旁边的陆炎德（当时我们都住

在集体宿舍的上层通铺)正在被办学习班,让他交代、揭发地院和他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但此事当时在干校并未公开,我之所以得知乃其自己所告。因由就是因我们相邻而卧,一日晨起前,他不断地发出向外作呕的声音,将我吵醒后,我问道:你怎么啦,想吐吗?不行就赶快起来去校医室。他回答说,不用,过会就会好的。对他这种能够有病不治,想拖着就会好的论调,我生气地说道:真是讳疾忌医!对此他解释道:我这是老病,肝区有些胀造成的,只要注意保证休息就没问题了。因我也肝功不好,对他的这一说法能够理解。所以就对他说,既然你知道注意休息就没问题,那你就跟领导说明情况请几天假不就得啦!接着他又说道:不行,现在正给我办学习班,让我交代“五一六”问题,成天都在写材料,所以人很累,那还能准我请假呀。就这样,我才知道干校已经开始在抓“五一六”,而且陆炎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了。由于话已经说到这一步,我也不便再问了,只说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病身体不适,还是需要治的。

与陆的上述对话尽管让我获知干校也已经开始在抓“五一六”了,但我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有想到借抓“五一六”为名,军宣队已经开始将整人的魔爪一步步地向我伸来,这是从我的妻子刘昭明的北京来信中得知的。请看她的回忆——

我于70年九月下旬请假回北京,准备接孩子返回干校自己照看。但正在我紧张地做作各项准备时(如购物,购食品、药品,准备各类衣物等),一天下午周家骏老师(五连指导员,翔雁原教研室的主任)突然来访。他因赴京调运设备而来,说顺便来看看孩子。因家里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他的,只给他倒了杯水。他和孩子玩了一会,并问了问准备的情况。此后他向我说道,学校即将全面展开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治运动,你是否知道?听后我倒反问他抓什么“五一六”?因我一直以来对政治方面的事很少关心,当时又忙于带孩子去干校的各项准备,还得抽时间给我母亲和侄子准备些过冬用的衣物被子,拆洗老人用的一些东西,真有些忙不过来的感觉,所以回京后与学校留京的人员几无联系,可以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面对我的反问和解释他也哑然了,并笑了笑接着

说道：“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是反周总理的。现在贾振远已经交代承认了，陆炎德在干校那边也交代承认了，下一步就要在全院展开揭批“五一六”的问题。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只要自己交代承认了，组织上就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否则就是敌我矛盾性质了。开始我对周老师所言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觉得他是不是有所怀疑或另有所指呢。我是个直性子人，有话憋不住，就立即问道：周老师，您说这些是不是有所指呀？面对我的诘问，周老师没有回避地说道：对，在前一段揭发中老宋也成为怀疑对象，所以我想请你多做一些老宋的工作，如果他加入过“五一六”组织，就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清楚。党的政策很明确，交代了就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让他不要有顾虑。如果他确实没有参加，请你也要告诫他，一定不要犯态度，他的性格你比我清楚，一定要劝他正确对待群众。总之，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说毕，他又问了问我准备何时回干校？我说假期到月底，我会尽力准时回去的。说完话，他就告辞要回去了，我对他的忠告表示感谢，并答应他一定会好好做翔雁的工作。

周老师走了，同时也带走了我内心原有的宁静，带走了全家即将在干校团聚的美好憧憬。因我和翔雁彼此已相识很久，我对他的品行、为人一直深信不疑。但为了不影响他，也为了免遭一些无聊人的议论，67年底以前我尽力回避他，所以对他文革前期的情况我并不十分清楚。再加上我对政治一直提不起兴趣，文革开始后，除了教研室组织学习讨论外，我只和系里的刘宗平、朱定宇、林x x等老师一起，聊聊院内外的的大字报、相关的首长讲话，有时也帮助系里将取回来的动态报和东方红小报等分发给各教研室。总之，文革中我一直处于逍遥状态，而且只要时间允许，我还需要经常回家里照看我母亲。因文革开始后，街道和红卫兵们，在同院邻居的挑唆下，几次三番地到家中盘查、抄家；还诬告家中院子里有地窖子，要挖地检查，并为地窖子的事罚我母亲跪地、抽打，强令交代；又以住房面积过大为由，强迫腾房等。搞得我侄子不敢上学，我母亲胆战心惊度日如年，故我必须时不时地回家看望并陪伴母亲，让她能少许安心一些。她老人家虽然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乱，但因一直本本分分的生活，从未经受

过现在这样明火执仗般的洗劫、殴打和恫吓。即使解放后当我父亲于1951年以莫名的通敌协助美军登陆秦皇岛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15年监外执行），他老人家在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靠卖掉院内的北房和三间东房和一些其他用品度日的情况下，对党和政府也从未发过一句怨言，总是要求我们好好读书，建设国家。而且，当58年天安门拆迁时，她还响应政府号召，将自家后院平房腾出出租，为此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但万万没想到，正是后院的一家租户，借文革之机勾搭街道，诬告我母亲，让红卫兵来抄家打人，而这时政府却没人出面制止。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有时我每天都要回家陪伴母亲过夜，白天还要陪她去街道，交材料、到银行交个人的首饰、存折和家中的其他财物，以及房地产证等。所以，我对当时乱而无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也很不满意、很不理解，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心中也无精力顾及其它。故当周老师提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事时，我还觉得十分陌生，似乎过去自己好像从未听说过一样。但以我对翔雁的了解，我深信他不会卷入其中，而且他也决不会对我隐瞒，特别是后者，我是坚信不移的！但面对周老师的告诫，我又不可能无动于衷，因我过去虽与周老师从无单独交往，对其为人不很了解，但他毕竟是翔雁和朱定宇老师原教研室的主任，也曾听他们说过一些对周老师为人比较肯定的评价。何况，周老师的劝告，完全是出于对翔雁的关心和爱护，决不能等闲视之，不当回事。而且退一步考虑，不管翔雁与“五一六”有无牵连，但万一因此挨整挨批，我带孩子同去干校后，岂不会再次陷入求助无人的困难境地。届时我和孩子能挺得住吗？就这样，翔雁会不会真的是“五一六”，翔雁会不会再次挨整，这时我要不要带孩子去干校等问题就搅得我难以安静下来，几乎到了日不思食，夜不能寐的地步。而在我身边的只有年已七十三岁还有很重肺心病的缠足老母，作女儿的我不能在她身边尽孝，不能很好照顾她老安度晚年就已很不尽职，哪能再拿自己的事去搅扰她本来就十分艰辛的生活呢？我的个性属于遇大事需打定主意时，往往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而一经拿定主意后，我会不惧困难刚毅应对，咬牙坚持的女性。如今我主要的不是担心翔雁和我自己，而是在明知翔雁有可能遭到运动冲击的情况下，要不要带年仅一岁八个月的儿子前往干校。

为了能尽快地做出决断，我一方面立即给翔雁写信，告知周老师所说的事情，让他按周老师所说的正确地对待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同时请他考虑一下，鉴于有可能再次挨整，孩子可否仍暂时留在北京交给原来的阿姨看管，并要求他迅速回信告知。同时，我又打电话给孩子他姑，请她尽快来地院家中，有急事相商。姑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接电话后第二天中午就来了。我将周老师前两天所讲的话，都向姑姑谈了，也讲了自己对是否带孩子前往的犹疑。姑姑听后首先询问了我所了解的翔雁在文革中的情况和我对翔雁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和姑姑说道：对地院文化大革命和翔雁在文革中的情况我确实知道的很少，但我相信他不会“五一六”分子，我相信他不会对我隐瞒。姑姑听后说道：周老师说的话很好，他是一个很正直干部，十分难得。你要翔雁认真好好想自己在“五一六”事件发生前后，学校的和他自己的情况，不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怀疑，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好好想清楚，按党的政策要求去做。并说师大现在也搞得很紧张，很多造反派都有可能卷入其中了。因我现在正忙于办调离手续、交接工作，没有参与到运动中，所以有些情况也不太知道。但看来上面是抓得很紧的，这点得让翔雁知晓。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错了就承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姑姑又说道：“五一六”的事发生在67年七八月份，那时翔雁身体已经不大好了，正要离开革委会，而忙于看病呢，也说不定就此逃过了一劫。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真实情况如何需要他自己认真去想。孩子问题姑姑倾向跟父母在一起，因届时她也离开北京了，真有点事就很麻烦。相反，即使孩子在干校生病，也可以马上在校医室就医，自己请假照看，谁也干涉不了。而且孩子的病也不会一来就出大问题的，孩子在自己身边，照看起来要方便得多！最后，姑姑问了我可能的离京时间，说她尽量和我们一起去江西，路上好有个照应。并说，让翔雁到清江接你们，我也想和他直接说说，劝劝他。经姑姑的分析和解说，我的心踏实下来了。主要是决定将孩子带去干校，今后有天大的事也再不分离。翔雁的事我也同意姑姑的分析，不管是不是，也必须要求他认真地去想，不能掉以轻心。几天后，我收到了翔雁的回信，他的想法和他姐姐一样，要我坚定地将孩子带去江西。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不是“五一六”，也从不对我隐瞒，让我

放心。并说军宣队想借故整他，他有思想准备，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犹如反干扰时一样。看到他的信，我最后的犹疑（万一非说翔雁是“五一六”怎么办）也没有了，一方面我相信他不会说假话；另一方面从我父亲被关押至今近二十年来看，错判（我们子女和母亲一致认为错判）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处于社会底层，只能正确面对，我妈妈带着我们还不是照样走过来了吗？若万一又出现同样情况，我们三人也将永远在一起，绝不气馁，一定要教育好孩子，共同度过今后的人生。我妈妈都能做到，我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

由于心定了，一切又回归常态。我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各项准备，也帮助年迈的妈妈做好有关的准备，只是在这时往往会想到前途未卜的干校之行后，何时才能再回京看望为我们操劳一生的老母，真是内心的凄苦未可名状呀。

在大致准备停当后，我和姑姑商量好回干校的日期，而且此间李树岩老师表示可以和我们同行，以便需要时能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对此我非常感谢，心想真是遇到好人了，后来订票时我将此告诉了姑姑，她也挺高兴的。我们订好了十一月上旬初经上海赴樟树的火车票（给姑姑订的是绕经樟树去抚州的票），因我想在上海给翔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作为礼物送给他，尽管我知道价格不菲，但对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有益的。他非常喜欢听18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音乐，只不过眼下电台极少播放，但只要家里有一台质量较好的收音机，今后收听的机会总是有的。否则今后需要再想买时，还得请假外出购买。现在孩子带来了，今后即使在干校扎根一辈子，只要全家生活在一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当时我内心思想最真实的写照，我已经不再考虑大城市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也不再思考个人业务上的追求和发展，我最向往、最需要的就是全家人能在一起，用不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生活，这就是我和家人的最大幸福了。

周老师是因为到北京调运机床，准备加强和提高干校机加工方面的能力，以适应干校下一步发展的需要。没想到周老师出于关心和爱护年轻人而且又是他的下属考虑，光明磊落很正面地去做工作这件事，却被同行去北京的煤田教研室李树岩老师，向干校军宣队揭

发，从而回干校后，周老师以“向“五一六”分子家属通风报信”的罪名被批判，并免去了连指导员的职务。

对周老师既讲原则，又讲政策，光明磊落的行事风范，我从心底里佩服和赞赏，也非常感谢他的关心和爱护。对他因我而遭到批判和弹劾，我也深感愧疚。他挨整被批、被撤职的事是在我被隔离后被批判时知道的，并心存感激。并且对此我也想好了，只要今后能出来继续工作，我会尽力尽责地多承担些，以作报答。这是我在隔离期间的内心承诺，后来我用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在武汉地院恢复、重建勘探机械专业付出了极大的精力，确保在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就能立即招收该专业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并在专业建设和专业教学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时周老师又担任了勘探机械教研室的主任，我也自然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副手，尽管学校没有任命，而且即使任命我也不会接受，因家庭原因，我已决定申请调离地院了。这是后话。

三、不祥之兆：收音机被窃

从昭明的家书中使我得知干校军宣队将继承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衣钵，但换了一顶“五一六”的帽子，想继续把我置于死地。但昭明的信件除告诉我周老师的劝告外，主要是一方面让我仔细想想是否确有其事，有则按周老师的话，老老实实交待、承认，绝不可作“五一六”的殉葬品；另一方面，则因发生此事后，她有点犹疑是不是还带孩子回干校。她说：如果万一你真出了事，孩子那么小，她一个人怎么弄得了。如果那样，还不如继续将孩子留在北京。一想到昭明可能因我会被整而动摇了带孩子来干校的决心，我真有点急了。因为上次朱师傅家的行为已令我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加之我姐姐即将调往抚州照顾老人，姥姥自身已七十三四了，加之又是缠足老者，请她老人家下三楼上四楼去看望外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若万一孩子再出点什么事，即使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准回京假期的批文，待我们到京时也是四五天以后的事了；而一旦请假遇阻，时间就更加滞后，

届时后果将难于想象。为此，我立即给她回信，坚定不移地告诉她：1、我不是“五一六”，而且文革中除参加《东方红》外，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其它组织，希望她一定要相信我；2、一定要将儿子带来干校，否则，一旦再出点事，我们将难于及时处理。来干校后，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起总能克服的。

这一想法被后来的现实所击碎，这是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用过往被整的经验，来看待即将到来的抓“五一六”运动所造成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也低估了他们竟会以捕风捉影的材料为依据，对无辜的嫌疑人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和关押式的审查，而且一关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昭明接到我的信件后，经过认真地思考，觉得我的分析有道理，孩子必须带来干校，即使再困难，也不能犹疑了。而且她坚信我是不会对她说谎的，我肯定不会是“五一六”分子，这也就帮她下定孩子与她同行的决心。当我得知她的决定后，我悬而不定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昭明母子于11月初离京经上海来到江西清江下车，同行的还有我姐姐和李树岩老师（当时昭明告我李是为了照顾她带孩子而特意同行的，为此我接车时还专门感谢了他，因此前我与他并不相识。但当后来得知是他揭发了周老师去向昭明交代政策后，我立即认为这是军宣队的有意安排，是一种暗中监督的非法勾当，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当接到他们母子后，我们先行到清江饭店安排好住处，因为天已过午，孩子明显有些犯困，昭明准备先安排孩子去歇一会，并告诉我，她在上海为我买了一台春蕾牌的半导体收音机，等孩子睡下后拿给我看，随后就带孩子先行离去了。请看昭明的回忆——

路途上一切都比较顺利，到达樟树后，看到翔雁来接分外高兴。我们终于全家人又在一起了，看得出翔雁看到孩子后的兴奋劲儿，看着孩子的脸一个劲的端详，他想抱孩子，但孩子认生，躲到我身后去了。我转身抱起了孩子，告诉他，这是你爸，好好叫爸爸。儿子轻声地喊了声爸爸，就又低头趴在了我肩上。翔雁满意地答应着并俯身亲了亲孩子的脸

蛋，他已经有十个半月没有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情感的迸发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低声说道，孩子还认生，慢慢来。他也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喊过姐姐后，我向他介绍了李树岩老师，并告知路上他帮了很多忙，为此翔雁也向他表达了谢意。

在站台上激情相聚的一幕过去后，我们拿上行李，带着孩子一起奔向清江饭店投宿。在大厅柜台，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后立即上楼安顿，因孩子在车上中午没怎么睡，现在已经有些晒得发蔫儿了。当安顿好后，我就先陪孩子休息，翔雁则和姑姑一起，说出去看看市面也离开了。

昭明知道，我姐约我看看市面不过是说辞，她是想跟我谈谈当下的形势和我的处境。我虽然没有完全懂得我姐的意思，但迟疑一下后就立即去赶她了。因清江市并不很大，我们两人就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并离开了马路，沿着铁道前行。因铁道沿线没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这也是我姐姐比我老道的地方。这时我姐才很严肃地问我道：周老师与昭明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吧？我点头应道：知道了。她又说：你到底参加过“五一六”没有？我有些烦气地回答说：你们怎么啦？为什么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呢？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我姐太了解我，她并没有因我的烦气而生气，相反更耐心地说道：你要知道，“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组织，所以你要好好回忆一下，千万自己不要犯糊涂。这时我的心也似乎平静下来了，很平和地向我姐说道：它再怎么秘密，加入没加入我总不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吧？！这些日子以来，我反反复复地想过不知多少遍，文革以来，我除了参加过《东方红公社》外，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他任何组织。包括东方红成立后，教师中的造反派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教联》，我们先已参加了东方红的人，就顺势也作为红教联的一员，而未再履行加入红教联的手续。这些过程都清清楚楚，怎么可能犯糊涂呢？对于我所说的，我姐虽也点了点头，但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地说道：这次中央关于抓“五一六”的是决心很大，政策也很清楚。就是一一定要将这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组织挖出来，而且只要参加者承认了、交代了，就没事了。所以你还是要仔细地好好想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也不要因为怕昭明接受不了

要离婚而担心，我会帮你做工作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在感情上真有些受不了了。自幼我们俩一起长大，既是姐弟，也是玩伴。自我11岁以后，她就承担起了帮助和指导我健康成长的责任。在学习和工作中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和她说，不论她说什么，我都不会反驳。她知道我从不说谎，尤其对她；也深知我不服强压，只从说理的个性。所以，我对姐说道：姐，我对你说过谎吗，我对昭明说过谎吗？要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这时我的眼泪已经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拿手绢擦了擦。看到这个情况，我姐动情地说道：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如今的斗争太复杂，师大也在大抓“五一六”（她是师大的干部），有些情况我都难于想象，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交代出来的呀！所以我才劝你要仔细地想想，你们周老师说得很好，如果你确实没有参加，要很好注意自己的态度，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说到这，我们就回头向饭店的方向走去。路上我又对姐说道：通过文革初期地院的反干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不了解实情且带有情绪的群众诘问了，相信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也不会去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而且，我也把在水边遇到何长工时，何部长说的：革命嘛，哪有不挨整的话告诉了她。表明了自己若真的躲不过这一劫，我将持什么态度。面对我的这一表态，她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挽着我的胳膊，慢慢地走着，我知道，此时的她，内心也是很难平静的。在文革那个只讲斗争，到处要制造出对立面和斗争对象的年代里，类似我们这种亲人挨整或即将挨整情况下，亲人内心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之苦，真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

而旅馆中的昭明虽然不知道姐姐会跟我说什么，但是，她是希望我能好好听姐姐的劝说，认真对待可能面临的复杂情况，让我们全家的生活少走些弯路。下面是昭明的回忆——

孩子很快就睡着了，我则因为别后再相聚的兴奋，一点倦意都没有，故随即起来，将随身的行李袋打开，把给翔雁买的收音机拿出来，而且还将四节一号电池装好，再将收音机放回盒子里，摆放在我的枕头边上，准备翔雁他们回来后再交给他，让他有一个惊喜，

这也算我的一份心意。一切整理停当后，我拿了洗漱用具去洗脸房洗了脸，并打了点水回房，趁孩子睡着给他搽了搽脸和手。看著他睡的香甜模样，思绪又飞奔到干校的新居，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浑身都觉得轻松无比。说也奇怪，在这一瞬间，翔雁可能再次被批斗、再次挨整的事，似乎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这种轻松中，我也渐渐因睏倦在孩子身边睡着了。

当孩子醒来后，我又带他去洗脸房给他好好洗了洗，然后带他在过道和房间里玩耍，等他爸和姑姑回来。直到天都快黑时，他们姐弟俩才回到饭店。从表情看出他们的谈话是挺好的，这也让我的心踏实多了。翔雁过来抱起了孩子，尽管他还有些认生，但终于让他爸抱了。我看着他爸抱着儿子的高兴劲儿，我就立刻回身向房间走去，想把收音机拿来送到翔雁手中，让他喜上加喜。但当我打开收音机包装盒后，一下就惊呆了，怎么收音机没了只剩下个空盒子呢？我不可思议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很快就意识到收音机是在我去洗脸房梳洗时被盗走了，而且怕被我很快发现，又将包装盒好好地放回到我的枕头边。我气急了，拿着空的收音机盒回到仍在楼道里玩耍嬉笑的父子俩和姑姑，告诉他们我有意买的收音机被盗了，因心里难过，我的声音都有些变了，孩子也被我的神态吓着了，一下扑到我的怀里。翔雁赶紧过来安慰我，大家又回到睡觉的房间，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却是再无收音机的踪影。姑姑说道，丢就丢了，下去找经理和保卫部门反映一下情况，请他们帮着查一下。我们按姑姑的意见找到经理和保卫部门的人，向他们反映了情况，并给他们留下了联系地址，但我们都知道找回的希望是渺茫的。这事发生后，我的心情一下子又跌至了谷底。我并不在意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太看重我想送给翔雁一件礼物的愿望一下子落空了；我忧心、难过的是，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我们的厄运难道就这样开始了吗？！

听说收音机丢了，我和我姐都劝昭明别急，先去前台找一下负责人，向他们反映一下贵重物品丢失的情况（在那个年代，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相当于我们两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确实属于贵重物品范畴），看看有无追回的可能。接着我们下楼去到前台，向饭店领

导反映了丢失物品的情况。接待人倒是比较认真地听取了昭明的叙述，并作了比较详细的询问和记录，并说他会让保卫部门很好的查查，但他也实事求是地说，估计能查到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一定会好好检查的，并在今后工作中注意防范。

对饭店领导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丢失物品难于找回也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留下联系办法后就返回了房间。昭明对此事一直有个心结，一者总怀疑是同室另一位女客（也是干校的，但已记不清姓什名谁了）所为；二者因是特意买了想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但未能如愿，心中总觉得是个不祥之兆。对此，我反复开导她，要她不要瞎想，并表答了对她这份心意的珍惜。所以至今那台收音机的包装盒我一直保留着，目前仍留在北京的家中，尽管那只是一个外观很粗糙的减震马粪纸做的盒子，但它却是一段经历、一份心意的见证，每当我整理东西看到它时，都会想起自那以后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四、妻子的回忆：一家三口回到干校

第二天清早，我们收拾完行装、吃过早点后，就奔向清江码头。上船后，姑姑一直在岸边看着我们离去，并频频地挥手，直到船已驶出很远，才转身离去。这时我回身看到翔雁眼里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了，我用手绢揩去了他脸颊上的泪水，轻声地劝慰着他，但干瘪的语言是难以抚平人们内心的凄苦和亲人生离的悲痛的。我只能抱着孩子，挽着他的胳膊，回到船舱坐下来休息，并把孩子放在他怀里，我想这可能会有利于他心情的平复。沿途他告诉我棚子还差得很多，骨架尽管已经起来了，但棚顶的材料特别是茅草还没来得及去割，回来安顿下来后，他会抓紧去做的。我看得出他很感愧疚的样子，我也知道他现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忙安慰他不用着急，以后我们一起做进度就会很快了。为了让他能放松下来，我尽力不问干校的情况，而是将姥姥的安置和身体情况很详细地讲述给他听，他很惦记姥姥，非常体贴和孝敬老人，但总觉得不能给老人一个安全舒心的生活环境而愧疚，但我深知，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很多事是个人无法解决的，有他的张

罗、奔走、操劳和努力，我母亲已经很知足了。随着话题的转移，看得出他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于是我们就带孩子一起到船舷旁看沿江的景色、过往的船只和水流碰撞时溅起的浪花。孩子是第一次乘坐江轮，加之江面和两岸的景物的不断变化，孩子显得很兴奋，一会指指这，一会指指那，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我们看了这孩子兴奋的劲头，会心地相视一笑。在相互对视的瞬间，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让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觉得幸福无比。现在想想，这种情感的悠然出现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那可视为我们婚后的第一次“旅游”，也是我们第一次带孩子一起“旅游”。这时，我们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丽景色，享受着孩子天真、活泼的尽情表演，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在秋末冬初的温暖日光下，任由清风拂面而过，我们俩，不，是我们仨，此刻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梦幻之中。在那一瞬间，似乎没有了批判、批斗、交代、打倒、横扫、投降、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抗拒从严等梦魇般令人生畏的语汇，没有了围绕在我们周边令人防不胜防的恐怖氛围，也忘记了即将到来的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忘记了那个时代所有以整人为己任的一切。但事后的历史进程证实，当时多少有些罗曼蒂克式的幸福确实只是一个难圆的梦，我和孩子将迎来一场更加严酷的考验。

船溯江而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仁和靠岸了。下船后我们将所带的大部分东西暂先寄存在家住仁和的地院同事家中，带上一些必要的东西，抱着孩子走上了返回龙陂的路程。因路是上坡，十几里山路走下来还是比较艰辛的。尽管已是初冬，翔雁和我的衣服都已湿透了，我们只能走走停停。孩子终归是孩子，他那会知道父母的艰辛，而是面对从未见过的山路环境，这捡块石头，那拔根小草，高兴地跑来跑去。看着孩子的兴奋劲儿，我们劝李树岩老师自己先行，因他带的东西也不少，满头汗水跟着我们走走走停停更累，最终他听从了我们的劝告，自己先走了。我们不敢让孩子在路上尽情地玩耍，因回去要安顿下来还需要费一些时间，只能又抱起孩子继续前行了。

到家后，趁身上的余热和天还不太凉，赶紧给孩子洗了洗并换上干净的衣服。这是他到干校后和父母在一起住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愿意他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享受和父母在一

起的美好时光。接着我赶紧给他准备晚饭，因路途上的兴奋，他几乎没有午休，肯定一会就会晒得拾不起个来。在我给孩子准备晚饭时，看着翔雁和孩子玩得那么高兴的样子，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他疼爱孩子，我决定把孩子带来干校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也想好了，今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把孩子带好的。

孩子吃过晚饭后不久就晒得不行了，安排他躺下后，给了他一瓶奶，他含在嘴里，没喝完一半就睡着了。我们看着孩子甜美的睡姿相视一笑，赶紧换下汗湿后已经变干的衣服，擦洗后换上干净的衣衫，简单吃了些东西，立即又投入到室内的整理，以免明晨起床后的忙乱。翔雁又让我到室外看了看棚子的搭建情况并说了他的打算，要完全搭好确实还有很大的工作量。看到他那有些愧疚的表情，我劝他不要着急，并说今天已经很累了，赶紧先休息，明天一早还得去仁和取回留存的东西呢。

第二天一早翔雁就骑车去仁和取回了留存的东西，有一些还是请王定山老师驾驶的手扶拖拉机捎回来的，否则还得再跑一趟才行。这一天我们两人都向班组请了假，继续在家里做必要的安顿。回到干校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管是熟人还是不太熟识的人，相遇或相见时，对方都比较冷淡，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基本上没有人问起我北京或孩子的情况。尽管我对此并不太在意，但它也明显地预示着某种不详了。当我俩在收拾棚子时，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翔雁，他很看得开地对我说：不用介意这些。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为人处世就遵循不卑不亢的原则，正正当当做人，正正当当干事。我们自己心中没鬼，就不用担心鬼来骚扰。别人爱怎么看，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看着他边干边说的样子，我不禁笑出声来。确实，他遇事后的沉着、理智让我十分欣慰，也让我多了一份应对困难的勇气。我们干活时，孩子就在旁边一个人玩，为了能很好照看他，我们只能一个人在棚子里边，另一个则在外边，隔着棚壁说话，这也算另一种情趣吧！■

【文摘】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

侯成亚（哲学64级）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文科综合大学，其老班底来自延安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1950年代，它所招收的对象主要是来自部队、党政机关及各条战线上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及模范人物，如高玉宝，郝建秀等，由所在部门、单位保送或推荐。60年代，开始招收高中毕业生，但思想政治条件要求较严，学生大都为干部、工农子弟。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干部、师生思想政治上比较正统。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人民大学的发动比较迟缓，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了“人大三红”这样一个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群众组织。

所谓“人大三红”，是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的总称。其实是这三个组织是“三位一体”的，其核心和主体是人大红卫兵。因此，说到人大三红，就不能说到“人大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是文革中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约有十来个来自人大各系的学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纪念堂前的“月台”上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人大红卫兵”成立时，校内的“文革”已闹得沸沸扬扬。师生在对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校长吴玉章一般每年只来人大两次，郭实际上是人大主要的领导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派别。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派是揭郭派，主张对郭影秋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另一派是保郭派，认为郭影秋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持这一观点的多是工人、干部。为了避免郭受到冲击，他们把他从家中转移出来，保护了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人大红卫兵认为有必要亮出旗帜，表明态度。于是就在8月11日夜深

人静之时揭出了《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严正声明》的大字报，指出，郭影秋究竟是什么人，应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揭发、审查后才能做结论，广大师生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错误是革命行动，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人大校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保郭派很快地就贴出了许多的大字报，对人大红卫兵的“声明”进行声讨、批驳，说人大红卫兵是“黑组织”，是“反革命”，并到处寻找被怀疑可能是人大红卫兵的学生，对之进行围攻、辱骂，弄得人大红卫兵成员东躲西藏，其活动也只能在“地下”进行。而揭郭派则认为人大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人大红卫兵的“声明”好得很，坚决予以支持。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8月17日，当时已进入中南海、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邓小平陪同），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和人大红卫兵代表进行了座谈，表示了对人大红卫兵的支持。更出人意料的是，在陶铸接见后第二天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北京市及来京串联学生、群众的大会上，人大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人大红卫兵”也一下子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但当“保郭派”清醒过来之后，马上就拿出了对策：成立一个叫做“八·一八红卫兵”的组织，成员数达千人，并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还高姿态地邀请“人大红卫兵”代表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这样，在人大校园内就出现了两个观点对立的红卫兵组织。

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代表之后，人大校园不仅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而且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群众组织，如：一部分由部队来的、观点与人大红卫兵一致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军”；一部分与人大红卫兵观点一致的教职工组成的“红卫队”。所有这些组织都与人大红卫兵联系密切，行动协调一致。到了1966年底，“八·一八红卫兵”解体，其成员有的倒向了人大红卫兵，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外出串联，到外地造反、闹革命去了。“人大红卫兵”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正当大家迷惘彷徨之际，1967年1月传来了上海工总司夺了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

革委会的消息，全国各地迅速地掀起了夺权的风暴（时称“一月风暴”）。这时，“人大红卫兵”才如梦初醒，开始筹划夺权行动。但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形势又突然大变。原“八·一八红卫兵”有一个叫赵桂林的人（政治经济系61级学生），在其组织解体之后，带了几个弟兄，到武汉去造湖北省委和陈再道的反，闹得天翻地覆，名声大振，被武汉造反派视为英雄。这时，他顶着从外地挣来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的光环，“杀”回了人大，把原“八·一八红卫兵”的一些成员又聚拢起来，成立了一个叫“新人大公社”的新组织，而且气势汹汹，与“人大红卫兵”开展了新的斗争。

这时，“人大红卫兵”才重整队伍，迎接新的战斗。为团结大多数，壮大力量，经人大红卫兵勤务组研究决定，成立“人大东方红公社”，将所有观点一致、但不适合加入人大红卫兵的学生教职工全部吸收进来，作为人大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这样，人大红卫兵一派至此名义上就成了三个组织，即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和人大东方红公社。

这以后，人大两派的斗争又趋激烈。两派不仅在校内对一些问题观点对立，而且在地盘上也以一条水沟和一条路（共青路）为界，南北各霸一方。两派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先是在大喇叭上你来我往地“文明”的辩论，后来逐渐演变为隔空争吵、叫骂。起初“新人大公社”在每次广播中，都要对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人大东方红公社三个组织一一点名，后来可能是觉得太啰嗦，干脆就简称为“人大三红”。久而久之，周围的群众都得知人大有个群众组织叫人大三红，人大红卫兵研究决定索性就自称“人大三红”。■

【文摘】

比赛革命的革命

——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胡平

一、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革命是一场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政治运动。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广泛的群众参与，就成为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文革中的群众参与给出解释。在我看来，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这当然不是说，在文革中，群众的思想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只是说，各种不同的思想行为大致都可归之于一个相同的心理动机。由于人们的处境不同，性格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以及诸如此类，因此他们的思想行为会表现出颇大的差异；但是，那并不妨碍他们在心理动机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二、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

众所周知，当年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起码是在理论上，大家都承认，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所排拒，甚至被认作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在一个高度革命化的、由所谓革命者掌控了全部资源的社会，革命和个人物质利益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本来，革命是贬低个人物质利益的。革命要求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革命具有克制个人物质欲望的斯巴达式的外貌。因此，革命具有吸引理想主义者的强大魅力。但与此同时，既然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既然革命被确立为人生的唯一价值标准，因此这种社会又不可避免地会依据人们的革命程度而安排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它势必要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给予奖赏和惩罚；因此，革命又常常是（虽不必然是）有利可图的，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必定是受剥夺的，是吃亏倒霉的。这就迫使那些本来不

追求革命的人也不得尽量做出要革命的样子。于是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革命追求有多真诚或多不真诚，你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不仅被大家视为唯一的价值，事实上它也的确是的唯一价值。因为其它活动一概遭到否认、压抑，或者是被局限在一个相当狭窄而又大体平均的范围之内。……人的物质欲望既有基本的满足，故而缺少迫切的冲动，再加上没有明显的诱惑和没有独立追求的机会；这就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民众将其精力投入政治，投入所谓革命。

三、没有对手的革命

由于十七年的极权统治，大多数人的思想心态均被铸入同一种模式，大家信奉的是同一套革命理论，服从的是同一个最高权威（甚至连文革的被打倒者也常常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尽管人们对同一套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各自心目中的领袖形象也远非一致；但只要大多数人还都认同一个权威，整个运动就必定还处于最高当局的控制之下，任何真正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观点和行动就必将遭到有效的压制。因此之故，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在没有公开的外部竞争者的情况下，文革势必成为一场内部的竞争。

文革既然是一场内部的竞争。因此，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说，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我们不能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最关心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是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文革的情况便是如此。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点更容易证明自己

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个人去做一件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这是一回事；一个人去做一种他认为最能招致好评的事，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把问心无愧作为最高标准，他会采取某种做法；一个人把赢得他人承认（或避免他人否认）作为最高标准，他常常会采取另外一种做法。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流行的心态是宁“左”勿右。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既是求胜的策略——左对了，证明你比别人更革命；这也是自保的策略——左错了，那也算认识问题，你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仍是得到肯定的。既然大多数人都宁“左”勿右，互相作用的结果，又怎么不导致越来越左的结局呢？本来，在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内部，在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内部，都存在着这种宁“左”勿右、越来越左的天然趋势；只不过在多元社会中，由于其它派别、其它运动的对抗和牵制，防止了这种趋势走向极端。整个社会有可能在各种对立的力量的相互制约中获得某种平衡；一旦社会本身是高度一元化的，那么，这种激进化趋势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照理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四、文革：表演革命的舞台

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而且，越是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越是那些处境优越因而自命不凡的人越可能感到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这场骚动与其说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如说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表明了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学生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最高当局，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最高当局为原则为光荣呢。

多年以来，共产党不断地向民众灌输它那套意识形态，灌输它精心编织的革命历史神话。这使得许多人（特别是许多青少年）对革命抱着一种高度浪漫化的憧憬，对革命的暴力行为怀有极大的欣赏和崇敬，对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充满效仿之心。因此，只要现实生活提供了某种理由或借口，许多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角色，以种种夸张的姿态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而那种普遍的夸张表演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煞有介事的气氛，以致于使得这些人把表演变得和真实难解难分。如果我们把这些狂热份子称作真正的信徒，那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过于装腔作势；然而，我们也很难把这一切仅仅称为表演，因为它的确造成了可怕的事实。

五、对若干现象的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文革中群众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了。不妨举几个例子。

1. 关于造反

和现今流行的解释不同，文革中的造反首先还不是对压迫的反抗。因为最早的造反者大都是红五类出身，党团员，积极份子，既得利益者，不错，造反是指对那些仍然享有正统地位的当权派发动攻击；可是，这种攻击决不意味着反抗正统。恰恰相反，造反者是站在更正统的立场，批判对方的背离正统。因此，只有那些原先就具有正统的身份，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最高当局的承认具有更大信心的人，才会率先打出造反的旗号，照理说，这种人既然是原体制下的受益者，因而似乎没有造反的动机；其实不然，因为这种人比别人更早地领悟出文革的意义，他们正要通过造反的行动来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尽管说到后来，造反派队伍吸收了不少原体制的受害者，少数造反派人士还萌生了若干异端思想，不过这两类人始终未能构成造反派的主流或核心。

2. 选择与被选择

许多原体制下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投入了造反阵营，那与其说是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被选择的结果。在运动初期，他们被强行排除在“革命”潮流之外，想“革命”而不可得；尔后，那个“革命”被宣布为“保守”，宣布为反动路线，于是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造反派。当然，他们之中的一部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歧视，反对压迫，这种反抗无疑是合理的。应当说这一部份人是比较自觉地选择了抵制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只是就整体而言，那些政治地位低下者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乃是文革那段特殊进程的产物，文革中最不寻常的一段插曲就是，以刘邓为首的党的各级领导人，依循阶级斗争的惯例，排斥和打击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群众以及敢于向上级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不管这种批评多温和或者是比正统还正统）的人；而毛泽东却站在了刘邓的对立面。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古代希腊的僭主就常常以下层民众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带领民众打倒旧体制和旧的统治者，建立起更彻底的个人专政。如此说来，下层民众起初把毛视为他们的解放者，后来又视为秦始皇式的最大暴君，那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3. 从右派到左派

人们不难发现，文革中的某些左派，骨子里其实是右派。也就是说，文革中造反派的某些（不是全部）成员，倘就其先前的思想倾向而言，实际上和五七年的一大批右派份子更为类似。这种人大都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揭竿而起、投身造反运动的。如果你认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动路线是打“人权牌”，那么，这些具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投身其间自是不难理解，但事情显然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所谓批判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这就怪了：为什么那些原来就有朦胧自由化倾向的人，倒会反过来对他们先前还暗中欣赏的人和事发动攻击呢？看来，那也应归因于比赛革命的心理。

不错，这种人思想“右倾”，故而在文革前不被组织信任，且常常受到批评；但在明确意识层面上，他们自以为还是认同革命，认同领袖，认同正统观念的。正因为他们痛感自己的革命性不被充分承认，所以他们把文革视为表现自己革命性、证明自己革命性的大好机会，因此积极投入文革。在反动路线猖獗之时，他们多半受到排斥，甚至遭到迫害。可是，由于他们在主观上仍认同革命，因此，迫害并未直接导致反叛意识；相反，它倒强化了他们的忠诚意愿（吃不着的葡萄格外甜）。尔后，毛号召批判反动路线，他们大喜过望。他们既把毛视为自己人；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进一步视为毛的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于是，他们就更加积极地为毛的路线而战。作为过去受冷遇被排拒的一批，如今，他们更急于显示自己对毛路线的理解与忠诚，尤其是想证明自己比那些先前被视为积极份子的人们更革命。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本来有的种种困惑与

怀疑统统丢到一边，把自己本来有的某种右倾情绪——如果它们不符合现今的毛路线的话——统统丢到一边。他们越是希图通过革命获得自我的肯定，结果便越是造成自我的迷失。

4. 关于群众性暴力迫害

文革中，群众性的暴力迫害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不论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暴力迫害提供了多少方便（包括不受制裁的特权），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相反，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因此，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施暴者呢？尤其是，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有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常常要违心地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反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行为往往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于师出无名。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借口，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无怪乎率先出手者总是某些根特红苗特正的人了。

更普遍的一个原因是，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激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激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它是理性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

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5. 关于“失控”

文革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空前的强大，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权力又空前的无能。譬如说，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下面的群众似乎都充耳不闻，阳奉阴违。这与其说反映了群众或群众组织的某种反叛性，不如说反映了这种群众运动的自身逻辑，反映了权力本身的二重性。权力的本性是禁止。换句话说，权力只可能对它要去禁止的事情有效力，但对于它不去禁止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效力。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地位相当于一个终审裁决者，他说什么是革命的，什么就是革命的；他说什么是反动的，什么就是反动的。当毛宣布某事是反动的时候，他的权力可谓锐不可当，因为紧接着就会是强大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对于毛承认其为革命派的那些人而言，毛的威力就相当有限了。群众组织在思想上接受毛的领导，但在组织上并不受毛的直接控制，其内部又无严格的纪律约束。除非大家自觉执行毛的指示，否则，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能够迫使他们不得不执行。不错，大多数人在主观上都是承认毛的无上权威的，可是，在这种群众运动中，大多数参与者最关心的是自己在竞争中胜过他人，因此，他们往往不会按照毛的指示去做，而是按照最可能使自己获胜的做法去做。正如前面分析

的那样，在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中，故意做出种种“过火”“过激”的行动分明是有利于自己获胜的，而一丝不苟地执行毛的指示反而会陷于被动。在毛这一方面，既然你承认他们是革命派，承认他们的大方向正确，这就意味着你对他们做出的“过火”行动会采取一种理解和原谅的态度。那自然只会助长种种“过火”行为变本加厉，屡劝不止。起初，毛“放手发动群众”，其目的很可能是假借群众的自发行动之力，狠狠地打击他的政敌，同时又乐得以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为名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但这种手段一经实行开来，毛也就使得自己对群众中的那些自发性的“过火”行动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得于此者必失于彼。

毛对群众或群众组织的“失控”并不是后来才发生之事。例如，老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毛泽东关于要团结大多数的指示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正想用排斥大多数的办法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大体上说，毛泽东越是支持某一派群众，那一派群众倒越可能对那些试图对其行为有所约束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这毫不奇怪，你给予的信任越多，你能施加的约束就越少。被支持的群众一方则有恃宠而骄，有恃无恐的心理，用当时的话讲就叫“自我膨胀”。对此，毛只有两个办法，要么，他干脆把群众组织打成反动，打成保守，然后强力压制。天之骄子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从“小太阳”变成阶下囚的。要么，他搬出另一支更具正统性的力量（解放军、工宣队）用以控制那些群众组织。最后，毛泽东恢复了各级党组织，结束了群众运动，重新回到传统的金字塔式的控制。

6. 关于造反派的内战

导致造反派之间长期内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造反派的分裂实属难免。文革既是比赛革命的革命，老的竞争者（保守派）退出后，新的竞争者必然出现。造反派内部本来就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当初为了对付共同的对手保守派，其内部矛盾隐而不显。一旦老对手被打垮，内部矛盾便尖锐化、公开化。造反派的分裂与其说是矛盾的产物，不如说是竞争的需要。要使竞争继续成为竞争，没有

对立面也会制造出对立面，而制造对立面的理由总是不难找到的。造反派通常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第三派势力一般都成不了气候。这和许多民主国家两党竞争的格局很类似，第三党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而是缺少存在的空间。要竞争，必须有两派；要使竞争保持高度的张力和集中的焦点，只需要两派。

造反派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争夺优势或曰争当核心。这种竞争比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竞争更不容易解决。当造反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时，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这就等于宣判了斗争的胜负结果。可是，面对着两支造反派队伍，中央不可能只支持一派不支持另一派，中央给不了胜负的判决，而造反派们又没有一种公认的决定胜负的竞争程序。我们知道，在民主国家，两党竞争是通过选民投票来裁决胜负的。文革中的造反派却并没有采纳这种程序。因此，造反派的内战势必旷日持久，并且愈演愈烈。再加上普遍的暴力崇拜。当着两派内战发生暴力冲突时，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消除它、防止它。许多人以为武斗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的必然产物”。有些人甚至欢迎冲突的恶性发展，因为那使得他们有机会效仿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谱写出一曲血染的青春之歌。本来，赞成武斗的人并不算多；可是一旦武斗发生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其规模便会越来越大。我并不否认造反派的内战也可能揭示出某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我相信，这种社会矛盾决没有尖锐到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地步。我也不否认在这场“全面内战”中，当局的纵容、挑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我这里主要是讲群众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把造反派内战归结为争夺权力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尽人皆知，权力只可能属于极少数人。大部份参与者不是追求权力，而只是追求自己这一派的优胜；这样，作为该派中一员，他就能分享到一份胜利者的光荣。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那种荣耀毫无价值，可在当时那种戏剧般的场景下（不妨想一想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它却使很多人感到莫大的激动。

7. 赶下舞台之后

很多当年积极参加文革的青年学生都回忆道，他们是在六八年底、六九间初离开学校，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之后，才开始对文革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刺激这种集体性反思的原因很多。依我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被赶下了舞台，失去了原有的角色。在被下放的最初日子里，有些人还力图保持先前的战斗姿态，他们不时地交流有关运动的最新信息，力图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努力实在没有什么意义。既然他们已经远离了舞台，他们如何还能继续表演？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开始对文革有了另一种审视的角度。他们开始产生了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这其实是很自然的。

8. 关于“峥嵘岁月”的回忆

三年前，一位昔日的红卫兵头头接受记者采访，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于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根据我的观察，上述表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一种特殊的兴奋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注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人们热烈地投入文革的基本动机。假如我们承认，许多群众参加文革，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革命，不如说是通过革命以实现自己，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是那样严重地限制和扭曲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们就对他们在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比较容易理解了。这也许是我的论点提供的最后一个证据。■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六月号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谈萧宏《广西文革解码》一文在史料证据方面的不足

历史学是实证之学，“无徵不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史学大师陈寅恪提出，历史研究应“无一字无出处”。即历史研究必须言之有据，每一说必须有文献等史料依据。

60后的萧宏在广泛收集文革资料方面下功夫很多，这在当下殊为难得。但其《广西文革解码》（以下简称萧文）一文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记述史料证据不足，特商榷如下：

1、萧文“南宁大洪水”一小节中，写道：“1968年盛夏……，解放路一带的‘四二二’据点被攻破后……‘四二二’派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8月8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命令控制左江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大洪水退却后，军队和‘联指’从地下人防工事中抬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记忆》181期，43页、44页）。作者的这些记述都无注明史料依据。地下人防工程人员被淹没是重要事件，值得深入发掘、拼接历史碎片、历史记忆，还原真相。

2、萧文“军人集团在广西布下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一小节中，写道：文革之初，韦国清就是广西军区第一政委。与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关系十分密切”，“韦、黄至始至终支持两广当地的保守派”，“1968年2月，由广州军区下令，将支持‘四二二’的部队调走；3月的广州军区衡山会议，黄永胜内定‘四二二’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四二二’”（同上，51页）。这些记述均无注明史料依据。即使按这三条，也难以判定，韦与黄“关系十分密切”。

3、萧文中“韦国清是全国文革中唯一没打倒的第一把手”（同上，52页）。此说不准确。事实是，文革中原全国各省一把手中没打到的，除韦国清外，还有吴德、刘建勋两位。吴德文革前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中央改组北京市委，他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文革中他一直在位。刘建勋（1913--1983）文革前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任上调任)，文革初曾写大字报支持学生造反，曾得到毛泽东表扬。1966年底--1967年初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后调回河南，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直至文革结束（见百度网）。

其他还有一些，因篇幅所限，不赘述。■

2. 赵昊明谈萧宏的文风

萧宏写的广西文革的文章，在境外的地方文革交流网上发过不少（笔名是“小平头”）。他掌握了大量的当地文革史的资料，对当地的造反派和支左的军队，对广西王韦国清的讲话指示，如数家珍。但是，在令人敬佩的同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他不像是写史书，而像是在写章回小说。他的文风华丽有余，而平实不足，情绪化很重，乐于煽情，不放过任何一个那怕是很小的制造悬念和戏剧性的地方，在上面大做文章。看他的文章，我不由得疑惑：这位萧先生是在研究历史，还是戏说历史？

或许，他本来就比不上《三国志》，而立志学罗贯中。我希望将来的青少年有新的《三国演义》。■

3. 王德生、朱力谈郑仲兵的《文革答问》

郑先生的这篇答问，深刻、尖锐，道破天机。我转发给多位朋友，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像这样的文章，贵刊应该多发。■

北京 王德生

读到贵刊183期郑仲兵先生的文章，入脑入心，深以为然，不知道郑老师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我不是官方媒体，只是一个史学研究者，我觉得郑老师是一个富矿。请代我请示郑老师。同意不同意？■

深圳 朱力

5. 王复兴更正

《记忆》182期（2017年4月30日）刊登笔者文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第16页须更改如下：

1) 第三段第2行：（注9），“注9”二字改为“同1”。

2) 第16页最后一行注释1改为2（“2”字在“薄亚达”三字前）。

3) 注2上面加一行注1，如下：1. 亚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刊于《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9月号。■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 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予庆 去病

本期版式：启 之

本期封面：水点儿